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六期
2012年5月　　頁267~316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

陳　正　國**

摘　要

1755 年的里斯本（Lisbon）大地震，引發歐洲思想界對上帝與災難諸般課題的重探與辯論。本文試圖探究學者相對較少研究的英國情況。本文認為，以神職人員、聖經學者為首的英格蘭智識界藉此地震的發生，積極強調正統論述如神蹟論、特殊神恩觀等，藉以抗抑十八世紀初以來擅場的自然宗教論述。此一波新教復興一方面揚礪了新教-民族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再度掀起對天主教信仰的攻擊。最後，英格蘭宗教界普遍將災難預警說，與即將爆發的英法七年戰爭勾連在一起，成為信仰、效忠、道德操守合一的民族教育。相對於英格蘭的新教復興，蘇格蘭宗教界，尤其是啟蒙思想家們普遍採取一般性的哲學思維，討論災厄、善惡的問題。蘇格蘭智識界面對新聞性、聳動性的歐洲世紀災難表現出異常的溫和與冷靜。他們一方面試圖回歸自然神學的傳統，避免神蹟、特殊神恩的論述；另一方面對於災難的超越意義追尋，則表現出極大的遲疑。

關鍵詞：里斯本大地震　自然神學　神恩　英格蘭新教復興　蘇格蘭啟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0.2.25 收稿，100.11.13 通過刊登。

* 本文最初稿本曾於 2009 年 9 月 21 日，台灣車籠埔大地震十周年當日，發表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講論會上。本文的撰寫動機，其實正是來自這個筆者未曾親身經歷的台灣經驗。本文也曾於 2010 年六月發表於台灣世界史討論會上。感謝在此二處講論場合中，對本文表示興趣、提出意見的同事與同仁。學報審查人的專業意見，使本文在修改中獲益匪淺。筆者由衷感謝。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於1755年11月1日萬聖節當日，發生一起死傷慘重的大地震。長期以來，現代歐美史家無人懷疑此一天災對歐洲思想所造成的衝擊。但似乎史家們對次事件的影響之研究，頗詳於當時的德語及法語地區，而略於英語世界。[1]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陳述、分析英國思想界對災難的回應與思考。其次，本文希望能以（與德、法思想界）比較的觀點，略論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的思想風貌。誠如以下所論，在英格蘭，智識界對此地震的回應，多半來自宗教人士。因此本文標題中的「思想界」一辭，既指具有標竿意義的思想家，也泛指一般智識階層與作家。

歐洲智識界之所以對里斯本大地震做出廣而嚴肅的反應，主因在於該地震發生之時，亦正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盛期。在法國，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伏爾泰（Voltaire,

1 以筆者目前所見，有關里斯本大地震最詳盡的作品有 Ulrich Löffler, *Lissabons Fall-Europas Schrecken: Die Deutung des Erdbebens von Lissabon im Deutschesprachen Protestantismus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9); Grégory Quenet,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Jean Paul Poirier,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Lisbonne* (Paris: Odile Jacob, 2005); T. D. Kendrick, *The Lisbon Earthquak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55) 等。第一本德文著作雖列有某些當時英國對此事件的討論書目（p. 657），但沒有任何分析。第二及第三本法文著作雖不在書名上限定為法語世界的研究，但所論主要也都是法、德世界的反應。第四本英文著作主要則是處理葡萄牙社會，尤其是政府對該災難的善後與處置。有關里斯本大地震的歷史研究論文也多半集中於對德、法世界的思想衝擊。據筆者所見，早期唯一一份花費比較多篇幅討論英國（神學）思想對里斯本地震的反思者，是 Edgar Brightman 的 "The Lisbon Earthquake: A Study in Religious Val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3:4 (1919), pp. 500-516, particularly 513-15.最近數年開始有學者對英國的群眾反應以及宗教人士對里斯本地震的回應進行論述。但據筆者比對，這些文章重複性高，而且尚不夠全面。例如 Mathew Georgi,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British Public Sphere," in Theodore E. D. & John Radner (eds.) *The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Representations and Reaction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5), pp. 81-96. 以及 Robert G. Ingram, "The Trembling Earth and God's Herald: Earthquakes,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Britain during the 1750s," in *The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pp. 97-115. 筆者希望在此對英國思想界的回應，有一較完整的分析，而中文世界對此一課題似乎尚無學術專文。本文也希望一併補此罅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94-1778）、奎內依（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涂高（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227-81）等標竿型思想家或已經以文章傳世，或剛嶄露頭角；以狄德侯（Denis Diderot, 1713-1784）為主所編輯的《百科全書》（*Encyclopaédie*）正進入如火如荼的編撰與出版階段。在德國，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已過了而立之年，正準備在思想界展翅翱翔。在英國，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已完成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並已著手進行他著名的《英格蘭史》寫作。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90）已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席，即將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思理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科學實驗與傳佈正藉著俱樂部、社團等民間組織向社會傳布、深化。文人社團、報紙也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2]從長期的思想史發展來看，1755年的歐洲與英國，正處在一隻腳踏進現代科學主義思維的景況裡。然而，在歐洲，尤其是英格蘭，里斯本大地震卻給了教會一次良機，得以再次複製、申論許多傳統的神學意見與道德觀。相對而言，英國標竿型思想家並未利用這時事的動能，幫助傳播己身觀點，而是選擇以概化方式討論災難，以及災難所衍伸的道德與神恩等議題。

「里斯本大地震」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可分成兩個層次說明。第一，人與天災的關係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後逐漸失去存在意義的聯結。或者更精確地說，天災的自然屬性逐漸失去超越的意義；其所謂自然，是科學化的自然。科學化的自然觀讓天災成為自然史的案例。換言之，災難被歷史化了。第二，許多當時重要作家、思想家環繞著里斯本大地震，發表各種有關神學、人性、社會等等意見，使得此天災成為思想史的事件。歌德自稱，從他八歲接觸到里斯本地震的歷史之後便終生縈懷；並將此事件與（英法）「七年戰爭」、「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的時代」並列為「（改變）世界的事件」（Weltbegebenheiten）。[3]歌德的意思，應該就是指這一層的歷史意義。從長期的發展來看，現代性的重大特徵之一，就是歐洲人逐漸相信，人不該是命運與自然的奴隸。里斯本大地震的發生，正好如三稜鏡一般，將新舊各種不同的自然觀與災厄觀，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來。

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第一大城、最重要的商港以及貿易、文化中心。1755年11月1日萬聖節當天上午9點30分，天氣晴朗。整座城二十五萬居民多數已早早聚集在教堂準備參加彌撒。突然間人們聽到一陣巨響，教堂、屋舍隨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Robert H. Brown, "The 'Demonic' Earthquake: Goethe's Myth of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Fear of Modern Change," *German Studies Review* 15: 3(1992); 475-491, pp. 485-6.

劇烈搖晃了約三分鐘。之後約莫有一分鐘的靜止。須臾之間，劇晃再起，並持續三分鐘才又停止。約莫一分鐘後，天地又搖晃了三分鐘。此刻，許多屋舍、教堂已經無力支撐而傾倒。十一點鐘左右，五至十公尺高的海嘯撲向這座已搖搖欲墜的城市。此後零星的餘震不時降臨，祝融在城市各處肆虐達一周以上的時間。根據估計，有一萬四千座房舍在此次地震中倒塌，約有五萬人在此一事件中喪生。[4]地震的摧毀能力與它所能創造的輿論喧嘩能力成正比。如此重大事件自然很快地傳遍歐洲，並激起許多回應與討論。然而，里斯本地震之所以具有強烈的歷史意義，不惟獨是因為它駭人聽聞的殺傷力，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事件正巧發生於歐洲思想，以及社會傳播形式劇變的時代。這些條件因緣際會的出現，促使里斯本地震成為一面思想的巨大鏡臺，反照、折射出當時重要的新舊思想。

事實上，即使與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境內其它地震相比，「里斯本大地震」並不是最慘烈的地震。1666年的倫敦地震摧毀了一萬三千兩百座民房。1720年的法國普羅旺斯地震摧毀了十萬生靈。[5] 歐洲智識界並不陌生的1682年利馬（Lima）大地震幾乎摧毀了當地所有的房舍。[6] 2010年1月12日，海地發生芮氏七級的地震。根據官方統計，死亡人數高達二十三萬人以上，計有五萬五千戶房屋倒塌，三百萬人生活受到影響。地震在海地顯然相當頻繁。早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的1751年，海地就已經發生過死傷慘重的地震。據一位當時法國作家的描述，地震地區僅有一座房舍倖存。儘管如此慘烈，卻只有少數對殖民海地

4 本段描述係根據 Anon., *An Account of the Late Dreadful Earthquake and Fire, which Destroyed the City of Lisbon, the Metropolis of Portugal. 2nd ed.* (London: reprinted and sold by Green & Ruffell, 1756); Anon., *An Account of the Earthquake which Destroyed the City of Lisbon, on the First of November, 1755;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Previous to that Calamity: Illustrative of the Great Picture of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Now Exhibiting at the Lyceum, Strand (printed by W. Glendinning, n.d.); Anon., *A Genuine Letter to Mr. Joseph Fowks, from His Brother near Lisbon, Dated November 1755 in which is Given A Very Minute and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te Earthquake.* (London: printed for M. Collyer, n.d) 等記載綜合而成。關於第一次主震的時間，有多種不同的記載。或說九點三十分，或說九點四十分，也有九點五十分之說。關於死亡人數則有三萬、五萬、六萬、七萬、十萬等各種說法。根據今人推算，此一地震規模為芮氏 8.7 級。有關里斯本大地震原因的現代科學觀點，請見 Marc-André Gutscher, "What Caused the Great Lisbon Earthquake?" *Science* 305: 5688(2004): pp. 1247-8.

5 Gregory Quenet, *Les Tren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p. 305.

6 Ibid., p. 4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抱興趣的作家投以關注。相較於海地大地震，法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的則抱以高度關注與激切的迴響。此間的差異，並非完全是歐洲與歐洲殖民地之間的認同差異使然。里斯本地震發生之刻，正值現代的傳播、敘述等條件逐漸形成，使得相關的反省與討論以為加快速、有效的方式，在智識圈中傳開。環繞著災難事件的不同意見，彼此激盪的情形更加顯著，乃至於形成了論述的事件。尤有甚者，此刻歐洲人對於上帝／自然／災難等等概念的理解與認知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相對基進、反傳統或權威的言論逐漸浮出檯面。在法國，百科全書的出版（1751-1772）具體呈現了上述兩項思想與社會條件的變化。因為這些社會以及思想條件的因緣際會，「反思里斯本大地震」的各式言論，匯聚而成了一座現代思想的地標。里斯本地震發生後，除了見證者透過書信或讀者投書方式向親友或雜誌讀者的描述地震景象，尚有許多知識界人士發表評論與感想。但相較於法語世界有伏爾泰、盧梭等人，德語世界有康德等人針對里斯本大地震進行思考，英語世界卻不見有標竿型思想家或標的型論述出現。

為何英國思想界與德、法有如此明顯差異？誠如前述，災害之所以能成為思想事件，不完全肇因於思想本身；它同時與社會條件息息相關。可是，思想事件之初韌，畢竟是由思想者所發動、創造。思想者的年紀、思惟習慣、能力、乃至關心的課題等等因素，均在在影響了思想事件的形成與形貌。之所以英國、甚至整個英語知識界對里斯本大地震的反應與法、德語界頗為不同，正是因為此三文化圈的思想人物之特質大不相同。細審近幾十年來歐洲思想與里斯本大地震的歷史著作當可發現，近人討論的主題多半環繞在康德、伏爾泰、盧梭等思想巨人身上。然而，英格蘭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牛頓（Isaac Newton）之後便未再出現具有國際聲望的思想家。甚至以嚴格標準來說，牛頓的科學理論雖然影響十八世紀思想界極為深遠，但是他本人並不是神學、政治或社會思想家。英格蘭有高度文明發展，卻缺乏精彩的思想巨人；此一現象著實令研究十八世紀，尤其是啟蒙運動的史家相當困惑。已故歷史學者波特（Roy Porter）因此提出一個觀點，認為「英格蘭啟蒙」的實質或特色，不在思想的創造或高度，而在思想與知識的傳播與討論。換言之，不在思想家個人的表現，而在社會條件或結構。[7] 波特的觀點或許可以進一步審議，但他的觀察與本文所要討論的現象不謀而合，可以相互佐證。楊（B. W. Young）進

7 Roy Porter,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in R. Porter & M. Teich (eds.)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4-28; Roy Porter, *Enlightenment: Brita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0)。有關中文世界對此課題的討論請參考楊肅獻，〈英格蘭有啟蒙運動嗎？〉《新史學》第 9 卷第 4 期（1998），頁 1-37。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步認為，英格蘭啟蒙思想的底蘊，其實與宗教或神學思想息息相關。Samuel Clark 以及 William Warburton 等人在洛克的宗教寬容論之上，進一步推演出較諸傳統神學更具包含力的神學主張。果真如此，則地方特色（provincialism）反而成為英格蘭啟蒙的特質；儘管這些神學新世代的終極關懷具有普世意義。[8]

相較於大英帝國的中心——英格蘭——地處帝國邊陲的蘇格蘭與愛爾蘭在1750年代反倒出現幾位影響比較深遠的思想家。其中以蘇格蘭人休姆、亞當史密斯、亞當佛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以及愛爾蘭人柏克（Edmund Burke, 1729-97）等人為代表。有趣的是，上述幾位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卻未曾對此一事件表示任何具有關鍵意義的意見，甚至感慨。休姆是英國，甚至歐洲十八世紀最重要的不可知論者。他認為神之存在，並非經驗世界的真假議題——事實上我們無法透過經驗判定神是否存在。宗教之基礎，就是建立在信仰之上，不多也不少。他對宗教的批評在於宗教狂熱者以親身經歷的表述方式，強調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與普世價值。此外，休姆在1748年出版的《人類理解力之探源》（*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駁斥了奇（神）蹟觀點。而他最完整、重要的宗教論述，《自然宗教之對話》（*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則是創作於1751-55年之間，並且在1760年代多次修改。令人好奇的是，法國的伏爾泰因著里斯本大地震而對於神恩或神的世界創造觀點大加批評，休姆卻對此隻字未提。柏克在1757 年出版其成名作《吾人巍峨與美之觀念的哲學探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y*）。按理說，大地震這樣的自然災難可以視為巍峨概念的証據或反例；但柏克似乎不曾明白提及此事件，或據此進行哲（美）學思辯。[9]種種跡象顯示，英國思想界在面對宗教議題時，即使是反對宗教教條主義如休姆者，也是採取溫和的認識論態度。即使企求在「理性主義」高漲的時代為宗教的延續謀求可能性的思想家如亞當佛格森，也盡量不直接討論自然災難與個別神恩（particular providence）等神學概念，而是以概化的方式探討神恩與惡的概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B. W. Young, *Relig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ological Debate from Locke to Bur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9 Mathew Georgi 認為，對柏克而言，里斯本地震是個巍峨事件，因為地震釋放「強大力量，產生驚恐以及破壞」。但是筆者在柏克書中並未能讀出這樣的地震美學，更遑論這麼有指涉性的美學詮釋。究其實，柏克在書中提及地震，目的在於討論吾人對自然所興起的愉悅（delight），與 Georgi 的衍議似大有出入。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y* (Dublin: printed for Sarah Cotter, 1766), pp. 64-5.

然而，缺乏標竿型思想家的介入，並不表示英國的輿論或智識階層對里斯本大地震漠不關心。在英國，尤其是英格蘭，直接對里斯本地震事件提出反思者，其實大有人在。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多為神職人員或宗教人物，如宣教士與聖經學者。這些人對當時流行的自然神學、科學並不陌生。然而，他們卻利用里斯本大地震事件，重新強調傳統神學，突顯上帝意志、個別神恩、原罪等概念。並且，他們藉由對此事件的詮釋，在言談中表露對政治秩序，尤其是英國特殊憲政體制的信心，以及對社會秩序、風俗的疑慮，希望儆醒英國讀者注意個人道德，以取悅上帝。當然，在這樣的災難詮釋下，他們也替政權背了書。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藉著評論此事件，再次複製了對天主教教會的不信任。總之，正如本文所將論證者，英格蘭對此天災事件的輿論迴響，具有濃厚的道德教喻與政治目的，並且具有強烈的民族認同。這些現象或許與英格蘭國教傳統有關，但因為事發在英國啟蒙運動的高峰期，此現象值得未來研究者注意。

二、德、法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的反思

德語世界讀者在地震爆發後不久便密切注意這個災難的發展。《柏林新聞》（*Berlinische Nachrichten*）在11月11日便發佈了地震的相關消息。這比起同屬天主教國家，地理上更為緊鄰葡萄牙的《法國週報》（*Gazette de France*）早了十一天，比一水之隔的《倫敦雜誌》（*London Magazine*）早了十五天。[10]當時在哲學界開始嶄露頭角的康德就非常關心里斯本大地震的訊息。[11]除了盡力蒐集相關報導，他還親自觀察了波希米亞地區的溫泉湧泡，試圖以某種因果關係，將溫泉與地震做聯結性的理解，希望將來可以從水泡或水浪的湧現，預知地震的來臨。康德在1756年連續發表了三篇與此次大地震有關的論文。[12] 康德說，

10 十八世紀資訊的傳播速度與今天的科技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災區的資訊更不易向外擴傳。西班牙馬德里要到十一月四日才知道里斯本的災難。凡爾賽宮的主人則要到十一月十七日才知情。法國週報（Gazette de France）則要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才正式批露這個災情。見 Gregory Quenet, *Les Tren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p. 343.

11 康德在 1744 年自 Königberg 大學畢業後曾長期擔任私人家庭教師。1755 年他回到母校擔任兼任教授（Privatdozent）。

12 關於康德的論著可參考，康德著，李秋零譯，〈地震的原因〉，〈地震中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地震的繼續思考〉，《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409-454。德文本可參考 Immanuel Kant, “Von d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簡單的實驗就可以知道，鐵屑與硫磺以水攪拌，就可以引起煙校硝與震動。而這些物質都是土地裡常見的物質。但康德真正關心的地震原因不是何種力量造成振動，而是從地球的系統或結構來論地震的根源。他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地球內有大穴洞（Höhlen）。而地穴又多半與河流平行。如果人類居住地多高山，而所建聚落建築又與地穴平行，那地震災難就不可想像。理解自然系統，是理解自身安全與上帝神意的不二法門。祕魯人知道要將房子地基扎穩，屋頂以輕物質搭建。而普魯士境內絕少地震的可能，表示了神恩的安排。[13]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在里斯本地震後，康德對於世界的理解有了一個「科學的轉向」，明確地崇信經驗與物質研究對於知識建構的重要。此一轉向最終引導康德完成他對人類自由的倫理命題的建構。[14] 連咨（Michaël Reinhold Lenz, 1751-1792）曾經在科尼斯堡大學（Königsberg）上過康德的課。他在1769年，十八歲的時候寫了一首獻給俄國凱瑟琳女皇二世的長詩，題為《地瘟》（*Die*

Ursachen der Erderschüterungen bei Gelegenheit des Unglücks, welches die westlichen Länder von Europa gegen das Ende des vorigen Jahres betroffen hat"; "Geschichite und Naturbeschreibung der merkwürdigen Vorfälle des Erdbebens, welches an dem Ende des 1755sten Jahres einen grossen Teil der Erde erschüttert hat"; "Fortgesetzte Betrachtung der seit einiger Zeit wahrgenommenen Erderschütterungen," in Wolfgang Breidert (ed.), *Die Erschüterung der Vollkommen Wel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4), pp. 97-146.

13 " … so wird man leicht aus dem Angeführten abnehmen können, daß, da Preußen nicht allein ein Land ohne Gebirge ist, sondern auch als eine Fortsetzung eines fast durch und durch flachen Landes angesehen warden muß, man eine größere Veranlassung habe, sich von den Anstalten der Vorsehung der entgegengesetzten Hoffnung zu getrösten." Kant, "Von der Ursachen der Erderschüterungen bei Gelegenheit des Unglücks …,' Wolfgang Breidert (ed.), *Die Erschüterung der Vollkommen Wel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4), p. 103.

14 有學者認為：康德從這個災難消息與研究經驗發現，唯有與大自然的巨碩與深邃直接面對面，人類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而這個自由的意思是，人理解到無論他被放置在何種秩序或情境，他都必須為自己負責。見 Svend Erik Larsen,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the Scientific Turn in Kant's Philosophy," *European Review* 14: 3(2006): p. 364. 若然，那康德的自由觀念與蘇格蘭啟蒙的佛格森極為類似。請見陳正國，〈宗教與世俗的辯證——佛格森論歷史與自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與研究所集刊》，七十九本二分，2008，頁 187-233。可惜筆者未能從康德這三篇著作得到上述的結論。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康德對里斯本大地震的理解方式是純然的科學主義，他並不因里斯本大地震災難而懷疑上帝的存在。Immanuel Kant, *The One Possible Basis for a Demonst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rans. Gordon Treash (New York: Abaris Book, 1979). 關於康德如何在里斯本災難後重新思考上帝與自然的問題，可參考 Susan Neiman, *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7-84.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Landplagen）。此詩共分六部，分別講述人類所遭逢的大厄，諸如戰爭、飢荒、黑死病、火災、水漈等災難。詩的最後一部，論的就是地震。連咨對地震的描述，顯然是根據人們對里斯本地震的報導而成。[15]

此一災難也對當時德語世界的神學界產生了衝擊。包括海恩（Johan Heyn, 1709-1746），默色（Friedrich Carl von Moser, 1723-1798）等等在內的神學理論家，以及班多（Joseph Anton von Bandel, ?-1771）與歐托（Johan Jacob Otho）等福音教派人士都曾對里斯本大地震對自然神學的意義提出過思考。[16]其中登佐（Johan Daniel Denso, 1708-1795）傾向以自然科學史來解釋掉此一自然災難。登左是當時物理神學（Physikotheologie，亦即英語世界的自然神學natural religion）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評論道，正統基督教的神學並不能對此災難中的人提出撫慰人心的解釋。里斯本大地震對他而言不是世界末日的啟示，而是自然現象的表現。對此現象進行了解，反而能增進未來的科學知識。[17]登左的神學意見其實與康德的經驗主義或純科學的態度不謀而合。總之，里斯本大地震對德語世界的科學態度有相當影響；甚至普魯士國王斐特烈二世都對此提出個人的科學觀點。他認為地球中心是一團火，而里斯本正好座落在火團的上方。這是里斯本之所以如此強烈地震的原因。[18]相對於德語世界的狀況，在英國，接受自然神學的文人與思想家對此事件幾乎全無發言；只有福音教派的牧師企圖給予此一事件一個神學意義。

里斯本大地震對法國思想界所造成的衝擊，似乎較諸德語世界尤大。法語世界的反思對後世影響也更深，部分原因在於法語世界對此天災的言說，以許多不同的出版形式出現；其中至少包括詩、小說、書信、以及論冊等形式。法國社會對地震的記載與探討似乎有個傳統。法國人對法國以外的地震，也多所關注。[19] 根據研究，1666年至1744年間，巴黎科學院（L'Academie des Sciences

15 Jean-Paul Poirier,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Lisbonne 1755* (Paris: Odile Jacob, 2005), p.145.

16 Ulrich Löffler, *Lissabons Fall- Europas Schrecken: Die Deutung des Erdbebens von Lissabon im Deutschesprachen Protestantismus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9), pp. 271-303.

17. Ibid., 267-271

18 Jean-Paul Poirier, "The 1755 Lisbon Disaster, the Earthquake that Shook Europe," *European Review* 14:2(2006): p.174.

19 從十七世紀開始，耶穌會士就持續關心在中國的地震。十九世紀的天主教會百科全書，就有頗為詳細的紀錄。De. M. L'abbe & De M. Le V Walsh (eds.), *Encyclopédie Catholique: Répetoire Universal et Raisonne* (Paris: Parent Desbarre, 1848), p. 131. 其中提到 1699 年，中國某處地震，有四十萬人死亡。1679 年 9 月北京地震造成三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 Paris）至少舉行過二十七次有關地震的討論。[20]雖然在此一時期，與地震相關的科學、文學、甚至政治議題的討論逐漸浮現在公共領域中，可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傳統的宗教教義與文本，仍然是人們藉以理解、再現地震的重要媒介。[21]從長久的時間脈絡來看，法國或歐洲的地震文化自有發展的軌跡，而1740至1750期間則為地震文化轉變的關鍵時期。[22]在此之前，人們對地震有比較多的人文反思，在此之後的地震論述越趨科學化或精準化。此外人們也開始討論建築結構與地震的關係；政府在震災中的角色也越來越受到重視。[23]不過，即使以長時間的歷史來看，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事件仍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從1755年11月至1756年12月，巴黎科學院成員間論及地震的通訊就達九十二封之多。[24]里斯本的經驗應該是直接促成人們更詳細、甚至精細到以「分鐘」為單位描述地震的原因。但是里斯本大地震對法國智識界的最大影響，恐怕還不在對地震展開科學性的觀察、紀錄、以及提出解釋理論，而在於造成巴茲克（Bronislaw Baczko）等人所謂的「哲學地震」。[25]

造成法國哲學地震的人，正是歐陸當時極活躍也極富爭議性的思想界要角：伏爾泰。伏爾泰本人相當推崇英國的智識發展。除了洛克、牛頓的思想，他也是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忠實讀者。波普在1733-4發表了一時洛陽紙貴的詩論《人論》（*Essay on Man*）。《人論》所要傳達的信念與萊布尼茲的《神政》（*Théodicée*）的核心命題一致，認為神乃是以善，作為造世界的原則。整首長詩的意旨在於表示宇宙的和諧秩序，乃出自全能、全智、慈悲上帝的計畫。人的責任是謙卑：仰觀自然的美好和諧，俯首行善，努力保存上帝所賜。波普認為，人類會遇到自然與人為之惡，如地震、暴君等等，但這些惡畢竟無損於上帝的慈悲。上帝所要保全的是全人類，而非個別的人。個別的惡，無損於普遍的善：

當地震吞噬，或者暴風雨肆虐
城鎮成墳場，全人類便跌進深淵？
「不」（答道），「全能的第一因的運作

萬居民喪生。

20 Grégory Quenet,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p. 207.
21 Ibid., p. 226.
22 Ibid., pp. 272-86.
23 Ibid., pp. 392-7.
24 Ibid., p. 358.
25 Ibid., p. 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在個別對象，而在一般律則。」

……

既然瘟疫或地震都毀棄不了天的設計
何能區區一個玻吉亞或一個卡特林？[26]
(When earthquakes swallow, or when tempests sweep
Towns to one grave, whole nations to the deep?
"No ('its reply'd) the first Almighty Cause
Acts not by partial, but by gen'ral laws;
……
If plagues or earthquakes break not Heav'n's design,
Why then a Borgia or a Catiline?)[27]

《人論》裡的經典名句是「凡存在者，都**是**。（Whatever is, is RIGHT.）」。此一想法，顯然是對上帝的意志與計畫表現出至高的信心與崇仰。[28]既然伏爾泰對波普的《人論》如此傾心與熟悉，當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他耳朵的時候，他必然想到了的《人論》裡的詩句。然而，里斯本的災情，卻讓伏爾泰震驚不已。

里斯本大地震令伏爾泰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轉變。[29]他開始質疑萊布尼茲與波普的樂觀主義。[30] 地震發生的同年12月，伏爾泰發表詩論〈詩說1755年里斯本災難；或，檢證「全是好的」公理〉（Discours en vers sur l'homme: ou examen de cet axiome: tout est bien）。[31]詩中，伏爾泰批評人們以「神恩」來解釋（掉）

26 Borgia 指 Rodrigo Borgia。出身於西班牙，其後成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傳聞他的家族極為敗德。亞歷山大六世也常被史家認為是最無行的教宗。Catiline 指 Lucius Sergius Catilina（108BC-62BC）是羅馬政治人物。曾經密謀推翻羅馬共和。西賽羅將他描寫地極為不堪；甚至傳言他主持以人為獻祭的法事。

27 John Butt (ed.)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 Routlege, 1963), p. 509.

28 'Whatever is, is RIGHT.' 或許也可以譯為「凡是，均對」。此詩共分四部。寫作時間從 1730 至 1732。此句經典名句出現在〈第四部〉。*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ed. John Butt (London: Routledge, 1963), p. 509. 引文中的黑體為原文字樣。

29 在 1756 年一年之內，伏爾泰至少在 78 封信函中提到里斯本大地震。Grégory Quenet,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pp.395-6.

30 樂觀主義（Optimism）是 1737 年法國耶穌會的 Journal de Trévoux 上所創的一個字，用以批評萊布尼茲的「已經是最好的世界」（the best (optimum) world possible）的說法。

31 「全是好的」（tout est bien）是當時法文翻譯波普「凡存在者，都**是**」時的用法。當然，伏爾泰並不是第一位對波普的樂觀主義提出質疑的人。1755 年的歐洲世紀地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然災難的邪惡；並嚴肅提醒讀者，神恩的樂觀主義如果不是命定論，至少是智識的不作為、無知。此事件之後，伏爾泰經常說著「摧毀不名譽者」（écrasez l'infame），指的是舊政治勢力與宗教人員。

「神會忌妒，原罪的代價是死亡？」
何種罪，何種原罪，那些幼嫩的心能想得
倒在母親的胸膛上，流血、肢解？
已傾頹的里斯本曾經所犯的邪僻
可勝過現在沉浸在邪液中的倫敦、巴黎？
……
吾人過去只是淒苦的回憶，
現下是苦，除非明日清楚可知。
如果墳墓之夜摧毀思考者的存在，
有一天世界會變好，這是我們的願望。
今天一切都好，這是幻想。
("Dieu s'est vengé, leur mort est le prix de leur crimes?"
Quel crime, quelle faute ont commis ces enfants
Sur le sein maternel écrasés et sanglants?
Lisbonne, qui n'est plus, eut-elle plus de vices
Que Londres, que paris, plongé dans les délices?
……
Le passé n'est pour nous qu'un triste souvenir;
Le présent est affreux, s'il n'est point d'avenir.
Si la nuit du tombeau détruit l'être qui pense,
Un jour tout sera bien, voilà notre espérance.
Tout est bien aujourd'hui, voilà l'illusion.)[32]

發生前不久，柏林科學院舉辦一場論文競賽，主題正是討論萊布尼茲以及波普的神學觀點。得獎者 A. F. Reinhard 的〈比較波普與萊布尼茲論世界之完美，兼論樂觀主義〉(Le Système de Pope sur la perfection du monde comparé avec celui de M. de Leibnitz, avec un examen de l'Optimisme)，也不同意波普的觀點。請參考 Susan Neiman, *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8-48.

32 筆者未能在國內找到本詩的法文出版品，此處法文取自網路資料。似乎中文世界尚未翻譯此詩。http://www.site-magister.com/volrous2.htm。英文翻譯可參考 Liberty Fund 的網路圖書館文獻。
http://oll.libertyfund.org/?option=com_staticxt&staticfile=show.php%3Ftitle=349&chap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伏爾泰對神恩的質疑，引來盧梭在1756年8月發表〈盧梭致伏爾泰的一封信〉的公開回應與批評。盧梭的基本神學立場與波普相當一致：神恩（providence）是普遍的，而里斯本地震中受難的人則是個別的。盧梭以新教神學所強調的個人意志或選擇，認為這些受難者——他們之所以選擇居住在里斯本受難的此處，而非倖免的彼處——是出於自願的選擇。然而上帝的設計並不干預人的自由選擇。也因此，個人的受難與上帝之神恩無關。[33] 盧梭替波普的「凡存在者，都**是**。」命題進一步修正。他認為，上帝真正的神恩是「對整體而言是好的，或者，對整體而言都是好的。」[34] 盧梭自己非常清楚，伏爾泰的論述主要的殺傷力不在對傳統神學的摧毀，而在對信念、信仰的鬆動。盧梭於是提出一個只有邏輯卻缺乏思辨性的結論：如果我們接受「上帝存在，祂必是完美的。若他是完美的，他必是智慧、強大、正義的。如果他有智慧與大能，他就是好的。如果他是正義而有大能的，我的靈魂必是不朽的。如果我的靈魂不朽，三十年的生命對我而言，則無足輕重，它或許對宇宙的保存是有必要的。」[35] 對盧梭而言，正如對波普而言，人世間的苦難不是從里斯本地震才開始，也不會在1755年之後就結束。然而基督教信仰與災難之間的辯證是，我們不可能真正知道上帝的心智。[36] 1758年，亦即盧梭的回應出版兩年後，伏爾泰出版了著名的小說《憨弟德》（*Candide*）；他以黑色幽默的筆法繼續嘲弄萊布尼茲「已經是最好的世界」的觀點。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盧梭與伏爾泰正代表了了現代基督社會的兩股不相容，甚至無法退讓、相互解消的敵對困局。

正如Charles Taylor在一本近著中所言，強調神恩的自然神論對伏爾泰而言失之幼犀，因為它無法正視災難，無法更深刻地注視人類的悲劇。[37] 相對於伏爾泰激烈而絕決的批評方式，在英格蘭則上演一場對自然神學的保守對抗。許多英格蘭宗教人士在評論里斯本大地震時，回歸到舊約神學，強調造物者的意志、異象、警示、最終審判、啟示等等，重新強調人與神之間造與被造的關係，原罪的悔悟與潔淨的方法。

er=28298&layout=html&Itemid=27。

33 Jean-Jacques Rousseau, “Letter from J. J. Rousseau to M. de Voltaire,” in Victor Gourevitch (ed.)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32-246, p. 234.

34 ‘The whole is good or All is good for the whole.’ Jean-Jacques Rousseau, “Letter from J. J. Rousseau to M. de Voltaire,” p.240.

35 Jean-Jacques Rousseau, ‘Letter from J. J. Rousseau to M. de Voltaire,’ p.242.

36 Jean-Jacques Rousseau, ‘Letter from J. J. Rousseau to M. de Voltaire,’ p.240.

37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英格蘭對里斯本大地震的反應

相較於里斯本地震對歐陸所造成的思想衝擊，英語世界的啟蒙思想家們對此次重大災難的反應顯得相當平靜。[38]例如在北美，討論的聲音極為微小。相較於英國與法國，當時北美的科學社群尚屬草創階段。雖然「美洲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已在1746年創立，但活動相當少；直到1767年之後，該會才有定期的聚會討論。「美國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弗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90）集印刷商、作家、發明家、科學家、外交家、政治家等許多身份於一身，同時也是美洲哲學會的創立者。他以風箏進行的光電實驗是眾所周知的歷史故事。他發現，「光」與「電」其實是同一種東西。他的成功實驗，為他贏得許多人的尊敬。在英語世界，他被稱為「電之哲學家」。在德語世界，康德尊稱他為現代的普羅米修士，因為他引天火到人間地面。[39] 即使如此，這位北美的啟蒙運動先驅以及科學家，卻不曾對里斯本地震發表過任何正式意見。富蘭克林曾經想過，地震或許與空氣中的電流有關；可是，儘管有人鼓舞他進一步發表意見，他始終沒有答應。[40] 至於一海之隔的殖民母國，英格蘭與蘇格蘭，雖在科學創新與傳播上有重大成就，但對地震的科學研究與論述也不多見。

（一）地震的道德論述與反自然宗教論

英格蘭對里斯本地震的反省與論述，有兩大特色。第一，絕大多數評論意見出自教會人士。第二，絕大多數意見有明顯的道德化、政治化傾向。十八世紀的城市文化標示著現代歷史的重要特質，因此邇來學者常以城市文化，諸如商業、出版、交誼社群、閱讀社會等等新現象來詮釋公共空間或市民社會。[41]但

38 本文暫且不採用 Brian Young 等人的提議，不將宗教人士視為啟蒙思想家。

39 Joyce Chaplin, *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rsuit of Geniu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 136.

40 Chaplin, p. 138. 里斯本大地震過後十七天，美國麻州也發生一起不小的地震。Winthrop 在受到此事件影響而提出地震解釋時，就援引了弗蘭克林的電流概念。John Winthrop *Lecture on Earthquakes* (Boston, 1755). 但弗蘭克林本人對這些意見始終三緘其口，不表示贊同或反對。Dennis R. Dean, "Benjamin Franklin and Earthquakes," *Annals of Science* 46 (1989); 481-495, pp. 488-9.

41 此說自然是受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觀點的刺激而生。從社會結構的演變而論，此說有十足的道理。但若以影響社會的角度來看，與教會相關的機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對於十八世紀的多數民眾而言，教會及其建制，依舊是最重要的認識世界的管道。神父與牧師們親身講道後以出版小冊的方式，傳播他們的見解；雙重的傳播管道讓他們的意見不只影響了信眾，也進入了其他社會閱聽角落。甚至，它們本身就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因素。英國十八世紀的宣教士多半訓練有素；除了修辭學，他們對新科學的發展也不陌生。許多英國宣教士、國教神父精確掌握里斯本大地震的事件特質，傳達他們所希冀的宗教陶冶。例如James How就略顯誇張地以聽覺、視覺等感官上的刺激，鋪陳一幅似乎是他親身經歷過的里斯本世界末日景象：「……垂死者的呻吟，目睹眾多的死亡，想到下一秒自己就會被吞噬……想像……宇宙即將解體，世界將到盡頭。」[42] How甚至稱里斯本地震為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43] 生動的修辭是為了激起聽眾的情緒，以利道德教育能在閱聽者之間回響與進入。若說英格蘭的宗教人士主宰了英格蘭群眾對里斯本大地震的態度，應該不是過當之論。而事實上，在宗教人士，亦即是神學的再現與評論下，世界末日不只是文學修辭，而只是尚未被實現的真理。

英格蘭宗教界人士多半依循「原罪」說，強調災難係出於上帝意旨。里斯本地震是上帝對人類，尤其是英國人所發出的警告。他們甚至時常將〈創世紀〉的原罪，連結到〈啟示錄〉的末日論。這些宗教佈道的目的，固然在於強調道德純度的重要，在自然神論昂揚的時代，他們的論點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抵制了自然神論的世界觀。一位牛津神學院畢業的牧師說，「讓我們從《聖經》與理性下結論吧，地震就是上帝審判的*奇異工作*（***strange Works***），是原罪的合理結果與懲罰。」[44] 一如其它的災難如大火與瘟疫等，地震是上帝意志的展現。

制度可能更加重要。

42 '…… looking up and saw the lofty Buildings reeling like drunken Man, tottering and tumbling down about them; heard the awful Cracks of the Beams dislocated and rent asunder by the Violence of the Confusion, and the prodigious Sound of the ponderous Weights falling on the Ground, the Groans of Dying, and perceived the Numbers of the Dead, expecting the next Moment to be swallowed up themselves, every Thing in the utmost Confusion, stand amazed at the wonderous [viz] Sight, and imagine, as many of them did, that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was dissolving, and the World at an End .....' James How, *A Sermon on Occasion of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Rivington, 1756), pp. 4-5.

43 How, p. 21.

44 Charles Wesley, *A Sermon preached from Psalm xlvi. 8. Occasioned by the Earthquake on March 8 1750* (2nd Edition; London, 1754), pp. 5-6. 類似的意見見諸，Samuel Clark, *A Sermon preached at Daventry December 7, 1755 on occasion of the lat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Buckland, 1756), p. 12; John Milner, *Two Discours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觀點在里斯本事件之前，就已經是英格蘭宗教界的常見觀點。1750年3月，倫敦發生了有感地震，許多包括皇家學會的會員以及宗教界在內的人士都對此發表意見。[45]由於此次地震並未造成明顯的傷亡，於是宗教界很容易將此事件與上帝的「示警」聯結在一起。衛斯里公會共同創立者，查理士衛斯里（Charles Wesley）就曾對倫敦地震發表傳統的神學觀點：「神用地底的雷聲向你的心靈說話。上帝的*聲音已經傳到這座城市—聽這權杖，其及指派者*。他要求你必須注目他的權力與正義。*來，且看！*新的緘封正在打開。是，*來，且看*神的工作。*他對人子（所做之事）是如此的可怕。*」[46] 「緘封」是〈啟示錄〉裡的災難象徵。衛斯里的末日異象論在倫敦地震時，是宗教人士普遍使用的修辭。例如 Roger Pickering 說道，只有信仰與信心可以讓人在面對地震這樣的災難時表現出鎮定，猶如等待上帝的最終意旨或審判。[47] 里斯本地震之後，天啟或末世的言論再度出現。Peter Peckard 的表述可為代表。Peckard 相信，此塵世終究會毀滅。歷史上曾經輝煌過的民族、國家無一不在出現「警示性的災難」（signal Calamity）之後，立刻消滅或退化。里斯本是當時歐洲的商業與文化中心之一，正如倫敦或英格蘭正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商業與文化中心。Peckard 的神學式歷史解讀對其信眾與讀者而言，應該很有現實意義。[48]里斯本大地震因為是發生在他處，末世論的聲音自然稍不如倫敦地震時那般強大。但將里斯本事件理解成上帝「出言」警告的宗教見解，卻有增無減。其實，將里斯本地震視為民族

delivered at Peckham in Surrey on the General Fast, February 6, 1756 occasioned by the late dreadful Earthquake at Lisbon … (London: James Buckland, 1756), pp. 23-5.

45 "Mr Henry Baker F. R. S. to Martin Folkes Esq: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concerning Earthquake Felt at London Feb. 8, 1749-50,"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83-1775), vol., 46, pp. 601-3; "The President's Account of the Earthquake at London, March 8,"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83-1775)*, vol., 46, pp. 613-5. 這些意見都完全是經驗性的簡短描述。

46 Charles Wesley, *A Sermon preached from Psalm xlvi. 8 Occasioned by the Earthquake on March 8, 1750* (London, 1756), p. 16.本文斜線部份以及其他引文所現均為原文所有。

47 'I adjure you, by the *Interest* of that *Gospel* you profess, by the *Credit* of that *Faith* on which you rest your Soul, that, with humble Hearts, but with *Christian Confidence*, in your respective Station on the Spot where Providence had placed you, ye wait the Will of God; *least* the Scoffers at the Power of Godliness *rejoice*, and the impious Deniers of a Providence triumph.' Roger Pickering, *An Address to Those who have either retired, or intended to leave the Town, under the imaginary Apprehension of the Approaching Shock of another Earthquake Being the Substance of a Sermon …* (London: printed for W. Johnston, 1750), p. 30.

48 Peter Peckard, *A Dissertation on Revelations* (London: printed for W. Owen, 1756), p.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德的警訊，是英國教會人士普遍的態度；而對深信原罪的英格蘭不服從教派者（dissenters）而言，更是如此。[49] 對他們而言，宗教良心高於對王室的效忠，正如上帝的審判永遠正義。他們的基督教意識形態讓他們深信這災難是上帝出手教訓的異象。Joseph Baller 在其出版的佈道辭直接加上一個主標題，名之曰「對被關心與向善的罪民所發出的神聖警告與訓誡」。[50]

對這些宗教人士而言，原罪固然使得人類早已失去至純至善的美德，但在商業社會逐漸揚勢，國際戰爭與帝國衝突日益升高的時代，人類的道德危機猶如雪上加霜。里斯本作為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之一，其災難似乎是上帝對人類墮落表達憤怒的絕佳注腳。聖經中邪惡城市如索多瑪（Sodom）與哥摩拉（Gomorrah）一再被提起，與里斯本，甚至倫敦相提並論。[51] Alexander Cruden（1699-1770）就直接說道：「我相信，你不能，你真不能在你得知朋友將被*吞噬*，或處於*極度艱難*時，你卻在*奢侈*與*無度*中度日；不能在*遊戲場所*，啜飲原罪的*上癮淫歡*。」[52] 另一位宣教士，Thomas Edwards 的措辭明顯地更具針對性，可以說就是直指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以及阿迪生（Joseph Addison）等人的自利論與文雅論述。Edwards說，里斯本災難的原因，就是世界道德的墮落。

> 在我們這個大倡精緻與隨和的時代，酒醉、淫亂的罪，被人們用輕微的語詞諸如不謹、不慎所取代。而違法的權謀，被冠以時尚之名，稱之為英勇與文雅。友愛變成只是空話。極少人再有服務他人之心，除非他人可以同樣服務他。效法上帝的社會情愛，成了毫不慷慨的自利的受害者。公眾之益變成個人之福的反命題。[53]

49 Dr. Allen,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Fast-Day*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56), p. 30

50 Joseph Baller, *Divine Alarms and Warnings to a sinful People considered and improved: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Dilly, 1756).

51 Allen, p. 24.

52 Alexander Cruden, *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 Britain, occasioned by the Lat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 Buckland, 1755), p. 27. Cruden 是聖經學者，自稱 Alexander the Corrector。他同時出版另一份宗教宣傳冊子，主題雖非里斯本大地震，但宗旨相同。見 Alexander Cruden, *The Corrector's Earnest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Britain* (London: sold by A. Dodd, 1756)。引文中的斜體字為原文字樣。

53 'The heinous Crimes of Drunkenness and Debauchery, in the great Delicacy and Good-Nature of the Times, are palliated by the soft Appellations of Indiscretion and Imprudence; and the carrying on of unlawful Intrigues, by the fashionable Names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警示論是當時英格蘭宗教輿論的普遍看法。警示論之所以能成立，原因在於基督教的上帝是全能、造物的絕對主權者，他給予人類律法，並可能隨時懲處被造者。John Tailer 從里斯本大地震的反思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民族的興衰，完全操在上帝手中，是神意的產品。[54] William Peckard 說得更為詳白。他說：

> 不管說成是上帝意志在作工，或上帝特殊的安排，或[人類]德性的結果，是對邪惡的審判，不管是對一人而言是幸福，對其他關聯者是毀滅，或說成是自然之因的合湊產生自然的結果，通通沒有沒麼差別。因為所有的第二因，其始初本就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此世所發生的一切，在某個意義上，都是上帝的審判。[55]

Tailer 的神意主導論與Peckard的上帝審判說，代表了里斯本大地震之後，宗教道德家重述特殊神意論的普遍風潮。Mathew Georgi 已經發現，宣教士們不再以自然哲學作為解釋地震的唯一理據。[56] 本文以下將進一步討論，這些神意論者即使並非針對自然神論而發，他們的論述也與自然神論大相逕庭，並且對往後自然神論的發展產生影響。

Gallantry and Politeness. Friendship is degenerated into an empty Sound: Few, very few, will serve their Friends unless they can serve themselves: The God like Principle of social Love falls a Victim to an ungenerous Self-Interest, and the public Good is made subservient to Private Happiness.' Thomas Edward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Michael in Coventry, on February 6, 1756* (Coventry: printed by T. Luckman, 1756(?)), p. 14.

54 'but these records are conveyed to posterity chiefly for the wise and awful lessons Divine Providence intended to hold out from their examples; particularly, that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and national desolations, were equally the effect of divine agency; and that when God determines to build and plant, to pluck up, pull down, and destroy, there is no standing against the force of heaven.' John Tailer, *The Inefficacy of the Greatest National Strength to Secure from the Divine Judgment ...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J. Buckland, 1756), p. 5.

55 'And it maketh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is be said to be by a Providential Interposition, by a particular Appointment of God, as a Reward to Virtue, and a Judgment upon Wickedness; or whether the Happiness to the one, and this Destruction annexed to the other, be said to come on by a Concurrence or natural Causes producing their natural Effects; because the operation of all secondary Causes is originally an Appointment of God. So that every thing that happeneth in this World, is, in some Sense, a Judgment of God.' William Peckard, *A Dissertation on Revelations* (London: Printed for W. Owen, 1756), p. 49.

56 Mathew Georgi, p.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八世紀的科學與宗教曾經在「自然神論」上彼此找到平衡。[57] 自然神論的典型例子，是牛頓的天體觀：自然有其規律，規律背後表示有造物者存在。然而，正如同錶匠完成鐘錶後離去，但鐘錶自己卻有運行的規律一般，上帝在創造自然之後，也讓地宇自行運行，而不加以干涉。以哲學術語來說，自然神論認為，觀察人與自然的變化與原則，不需要考量第一因（上帝），只需考量第二因，諸如火、風、雷、雨等力量即可。用神學術語來說，自然神論認為，人只能掌握普遍神意（general providence），而不能理解特殊神意（particular providence）為何。然而，里斯本大地震動搖了自然井然有序，仁慈的上帝隱身與存在讓世人自由發展的世界觀。歐洲人被迫正視自然的突然性破壞力，赤裸裸地面對「惡」的顯現。在此背景下，特殊神意論的回流，毋寧是極為正常的現象。它試圖回答自然神論所不能言說的存在困境。William Nowell 在為里斯本大地震舉行佈道時，就明白的反對自然神論的常用譬喻道：「你說，是誰讓鐘在十二點時敲響？難道不是製造它的工匠嗎？」[58] Charles Moss 說：上帝要完成何事，並不會向人類表露；而「所有的宗教」也都同意：「特殊神恩（a particular Providence）既出現在個人身上，也出現在公共國家之上。」[59] 強調特殊神恩，就是承認奇蹟的存在。Moss 在此刻意強調奇蹟與特殊神恩而將基督教與異教相提並論，是對啟蒙宗教的反動。

同樣的，對Nowell來說，上帝之彰顯不在自然秩序的維持，而是在自然秩序的破壞上；亦即在祂的意志上。Nowell 對信眾說道，雖然我們不該將此地震看做是針對里斯本人民的懲罰，而是對人類的懲罰，但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是，上帝統管一切。

> [地震的]結果對我們造成恐懼與驚愕的震撼，此震撼讓我們對造成地震之原因興起崇拜之情。上帝的偉大與力量，他憤怒的可怕，他不悅的恐怖，都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見到了，他可以在天上或地上隨意處置何事；自然完全在他手中，所有自然的成因都等待他

57 Kund Haakonssen (ed.),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Rational Diss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 J. Barnett,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The Myth of Moder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Norton, *David Hume: Common-Sense Moralist, Skeptical Metaphysici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58 'Who will you say makes the Clock strike at Twelve, but the Artist who composed it?' William Nowell, *A Sermon* (Newcastle: printed for J. Richardson, 1755), p.8.

59 'That a particular Providence attends both Individuals and public States, is a Point in which all Religions are agreed, whether Pagan, Jewish, or Christian.' Charles Moss, *A Sermon* (London, J. Whiston & B. White, 1756), pp.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命令，去執行他的憤怒。[60]

如果自然神論淡化了人與神的關係，加強了兩者間那個中介角色——自然——份量，那里斯本大地震顯然幫助了許多宗教人士重新強調人與神的關係——絕對的傾聽與服從的關係。換言之，地震或災難具有絕對的道德意義。前文已經說過，里斯本大地震引來對商業與英國人道德的批評。W. Webster 的里斯本詮釋在本質上沒有不同，只是有意識地借用自然神論的語言，談述他道德化的災難觀點。

> 我們這民族注定無法因著國家的*地理位置*，或自然天候而躲避掉上帝的*審判*。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成為*全能者的朋友*。……公共災難的*第一*設計，是對公*共邪惡*進行*懲罰*，從而得到對上帝尊貴律法的公共承認……分辨出*墮落*的以及*謙卑*的、*有德性*的民族。[61]

John Pennington 說得更為露骨；他稱那些以自然而不以《聖經》為理解神意的人士，那些將自然災難完全歸因到自然因素的人士為「犬儒」（scoffers）。Pennington 的抱怨很能代表當時正統教會人士與自然神論者之間的齟齬。

> 或許有些完全不相信《聖經》經文，將所有這類事件歸諸自然因素與機率的犬儒，會對你們*此刻*的虔誠態度加以嘲笑。他們會告訴你，*地震*只是自然因素的結果，*戰爭*是道德因素的結果；他們會說，自然因素產生自然結果，道德因素產生道德結果；他們會說，在這些[自然結果]*例子*上，你們的禱告不會有任何果效，不會改變事物的原因，不會阻止結果，因此無效而白費。但是，你們這些相信上帝話語的人，可以更有恩典地告訴他們，你們擁有上帝親口的話語，不

60 'We are struck with Horrour and Amaze at the Effect, which leads us to admire and reverence the Cause that produced it. The Greatness and Majesty of God, the Dread of his Anger, and the Terror of his Displeasure are set in array before us: we see He can do whatever pleaseth Him in Heaven and in Earth; that all Nature is at his Command, every Element ready waiting to obey his Orders, and execute his Vengeance.' William Nowell, p. 14.

61 '…we of this Nation can have no Security against the *Judgments* of God, either from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or the *Nature of our Climate*; but that our only Security must lie in making a *Friend* of the *Almighty*. … The *first* Design of *publick Calamity* is, the *Punishment* of *publick Vices*, and thereby the publick Vindication of the Honour of God's Laws … by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wicked*, and pious and *virtuous* Nations.' W. Webster, *The Nature, Causes and Design of God's Judgment: Set forth in a Sermon* (London: J. Brotherton, 1756), pp. 1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管是自然或道德因素，都在上帝權柄之下，都隨祂的意思進行。[62]

另外，John Cradock 以幾近學術討論的口氣在一份佈道辭裡論道：即使這世界表面上是由「第二因」所構成，井然有序，但其實它終究是上帝所造。因此，上帝不可能不會隨時改變祂原先的設計，改變事物秩序的軌道：「所謂第二因，就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目的在完成對祂而言是好的事物。」[63]

總之，里斯本地震之後，英格蘭宗教人士趁勢進行了一波新教復興。正統新教的基本教義如福音、末世、耶穌二次降臨、特別神恩等等傳道如雨後春筍，在英國，尤其是英格蘭展開。[64] 自然神論所要建構的宇宙自然圖像，以及上帝的慈悲，如今已經被「恐懼」所取代。國教神父Philip Bearcroft直截了當地宣誡：「對上帝恐懼是特別而難以估算的財富，它讓我們遠離其它所有的恐懼。」[65]有一位作家在里斯本地震後不久，即匿名出版了〈里斯本地震詩〉（Poem on the

62 'Perhaps some Scoffers, who believe Nothing in Scripture, but ascribe all Things of this Kind to Nature, and Chance, may laugh at you for your Piety on *this Occasion*; and tell you that *Earthquakes* are the Effects of natural Causes; and *War* the Effects of moral Ones; that natural Causes must produce their Effects; and moral Causes will produce theirs; that in *these Cases* your Prayers avail nothing; they can neither alter Causes, or prevent Effects; and therefore are fruitless and vain. But you, who believe the Scriptures to be the Word of God, may with a much better Grace tell them, that you have God's Word for it, that both natural, and moral Causes act under him, and do his Pleasure.' John Pennington, *A Serious Call to Repentance A Sermon* (Cambridge: printed by J. Bentham, 1756), p. 9.

63 '"For tho", in general, God conducts the great machine of the universe by uniform and stated laws; yet may he not, as he shall see occasion; and in fact Has he not sometimes made alter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se laws, to serve particular purposes of his wisdom or goodness? There can be no satisfactory reason assigned why events, which are apparently brought about by second causes, should not be ascribed to the immediate appointments of Providence: For what are second causes, but instruments in the hands of God to accomplish whatever seemeth good unto him.' John Cradock,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Paul, Covent Garden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S. Baker, 1756), pp. 13-4.

64 'Providence has already given us sufficient intimations, that even by the operation of natural causes, our houses, our towns, our cities, may be in an instant destroyed, by the trembling of that earth on which they stand. But, what if no such natural causes should subsist? Cannot that almighty being, who first formed the earth out of nothing, shake it, without their concurrence, at his pleasure, and, an any particular part of it whatever, cause it to become to its inhabitants a pit of destruction?' Charles Bulkley, *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Evening-Lecture ...on Sunday November 30, 1755* (London: printed for J. Payne, 1755), p. 27.

65 Philip Bearcroft,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Owen, 1756),* p. 15.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Earthquake at Lisbon）。此詩與伏爾泰的《詩說》之間應該沒有對話關係。即便如此，我們對於這兩首詩在宗教態度上的巨大差異，卻無法不特別注意。相較於伏爾泰對神恩的質疑，英格蘭社會對上帝普遍懷著感恩的心，敬謝上帝未降災於英國土地。這種虔誠心態不只出現在宗教人士身上，也同樣出現在俗世作家身上。[66]《里斯本地震詩》可以視為代表。此詩明顯是首勸信詩，它寫道：

無神論者再也無法自我欺瞞，
但為時已晚只能抖顫，
善人勇敢面對命運，
巨晃中兀自挺直不紊。[67]
(Atheists no longer can themselves deceive,
And now too late they tremble and believe.
But the good Man looks boldly on his Fate,
Alone unshaken in a shaking State.)

詩末，作者借用《聖經》〈啟示錄〉中的異象，表示只有宗教信心才能在面對最後審判時帶引信者進入永恆的國度。

當第六封緘印開啟
圓形世界就隨最後一次地震而平夷
……
你們身穿白袍一字排列下跪
在座前叩首—然後是恩饋
你們將配戴祂的天冠
最閃耀的珠寶在前排褶褶發光
(And when on opening of the Sixth great Seal,
With her last Earthquake this round World shall reel,
……
In Garments white array'd shall bend the Knee,
And bow before the Throne ---- Then Charity,
Thou in his heav'nly Crown a Place shall bear,
And sparkle in the Front the brightest Jewel there.)[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6 'Let the Reflection then upon our Safety, and those invaluable Privileges, which through the divine Lenity and Forbearance are still continued to us, excite our warmest gratitude.' Samuel Clark, p. 22.

67 Anon., *Poem on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W. Owen, 1755), p. 5.

68 Ibid., p. 11.

雖然詩人所用形式不同，但他的語言、思想資源、對災難的態度與反思，與宗教人士的信念實無二轍。如果法語思想界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後，因著伏爾泰的《詩說》經歷了一場哲學地震，英格蘭顯然是在同一事件後，普遍進行鞏固信仰的工程。

（二）災難政治學與民族認同

英格蘭智識階層對里斯本地震的反應中，最值得注意的面向，應該是評論中所反映的民族認同與對天主教的敵視。英格蘭民族在十六世紀建立國教（Anglicanism)的過程，伴隨了民族認同與對天主教教廷的仇視。在英格蘭新教的論述裡，天主教成了不自由、迷信、落後、專制的象徵。里斯本大地震方便了英格蘭信眾重新點燃這個歷史記憶。一位佚名作者在1756年發表了《對諸多火、水、土地的不尋常現象的物理性及道德性反思》。他認為自然界的奇特現象或災難的秘密就藏在摩西的話語，也就是希伯來文裡。他說，要真正了解地震的可怕現象，「只能從《聖經》，而且*只能*從聖經的*原始*語言著手。」作者相信，地震的物理成因是藏在「深淵」（Great Deep）裡頭的水與風，在深淵的縫隙或地基裡，產生劇烈而規律的壓縮。[69] 然而這位作者對里斯本地震的道德原因更感興趣。他強調，「摩西告訴我」，上帝不准人崇拜偶像，但「天主教國家卻有著褻瀆的上帝神像以及處子聖女瑪莉亞的詩篇與宮殿。」[70] 在天主教國家中，海洋國家葡萄牙似乎罪加一等，因為他們把聖安東尼（St. Antonio）當作海神，祈求風浪平靜。「此種行為與西伯利亞的野蠻民族歐斯提亞克人（Ostiacks）並無不同。」[71] 這位作者接著說，「如果無知而未啟蒙的可憐的歐斯提亞克人還情有可原，那有著*神啟與知識*雙重優勢的人，就不該有任何藉口。如果偶像崇拜在聖經中的定義是崇拜所有『不是上帝』（Not God），希伯來文稱為 Lo El，那麼我們當可結論道，相較於大多數的*野蠻民族*，*葡萄牙人*無疑更是*崇拜偶像者*。」[72]里斯本災難讓英國社會再次集體地而公開地陳述對天主教信仰的不信任；與此同時，英國這個新教國家透過這次事件，也再次演示了國教的集體認同。

一份當年的宣傳性論文，〈倫敦教會人士寫給浩劫餘生的里斯本居民的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9 Anon., *Reflection Physical and Moral upon the Various and Numerous uncommon phenomena in the Air, Water, or Earth, which have happened from the Earthquake at Lima,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56), p. 55.

70 Ibid., p. 51.

71 Ibid.

72 Ibid., p. 52.

封信〉，很露骨地藉由此次地震挖苦葡萄牙人民。它說，儘管羅馬教廷教導你們視新教徒為嚴酷而不仁慈的人，「但當我聽到你們的災厄時，*我有如死人一個*。」[73]此文嚴厲指責宗教裁判所的設置與殘忍行徑，並且認為「我相信你們當中應該很少人不了解，那些被你們可怕的宗教裁判所折磨致死的千千萬萬人的哀號，很可能招致上帝的報復降臨在宗教裁判所的所在地。但這尚非全部。」[74] 這份宣傳小冊在一年內至少再版四次以上。由於反教宗、反天主教的情緒過於普遍，使得一些英國國教牧師必須出面勸導信眾，強調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就應該有同理心與同情心。[75] 比較溫和的牧師則藉由里斯本地震當作自身的警告：「我們可以沉醉在感謝上天的情緒裡卻不必有驕傲的比較。我們之所以被放過，並不是因為我們比葡萄牙人好，而是因為我們可能比較好。他們的事例是我們的警告。我們一樣都在上帝的手裡。」[76] Thomas Gibbons 雖然鼓勵英國人對葡萄牙人施予同情，但言談間流露十足的新教優越感。

> 他們[葡萄牙人]當然值得我們的同情，……儘管他們陷於教廷的迷信，儘管他們的心智被教廷的殘酷灼燒著，……但他們依舊值得我們同情。……讓我們祈求上帝去啟蒙他們的心智，讓他們悔悟重生，讓他們在最清澈的福音裡，讓他們有最得勝的力量。[77]

雖然其他宗教人士不像上述那位佚名人士一樣挑釁、幸災樂禍，但他們在

73 Anon., *A Letter from a Clergyman at London to the Remaining Disconsolate Inhabitants of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R. Griffiths, 1756), p. 3.

74 Ibid., p. 11. 同年，有位佚名人士出版一本書，專門批評羅馬教廷，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制度。其中，作者提到一位被審判的 Chevalier d'Oliveira。他因為出版*傷痛的論說*（*Pathetic Discourse*）向國王陳述里斯本大地震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審問。作者除了控訴宗教裁判所，還很有意思地表示，他在葡萄牙不會像在都鐸英格蘭瑪麗女王的時代一樣，被國家以叛國罪起訴，而是以宗教異端起訴。Anon., *Authentic Memoirs concerning the Portuguese Inquisition* (London: printed for W. Sandby, 1756), pp. 178-87.

75 "Nay, are they not *Christian*? Though unhappily fallen into many Errors; yet to they not acknowledge the *same* God, and are they not the Disciple of the *same* Jesus with ourselves?" Samuel Clark, p. 12.

76 John Milner, *In Discourses Delivered at Peckham in Surrey*, p. 30.

77 'Surely they are Objects of our Pity, … if they are immersed in *Popish* Superstition, if their Minds have been inflamed with *Popish* Cruelty, … yet still let us not deny them our Compassions … Let us beg of God to [e]nlighten their Minds, to give them Repentance unto Life, and let [them] in the Gospel in its clearest Purity, and most victorious Power among them.' Thomas Gibbons, *A Sermon … on occasion of the tremendous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 Buckland, 1755), p. 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佈道中所透露的民族認同卻是一致的。James How 不認為里斯本地震是因為葡萄牙人有較諸其他國家更深的罪孽。[78] 他相信上帝總是一體同仁降災與人；好人與惡人同受苦難。祂「復仇的箭」朝人群射去，不分賢與不肖，如此才能彰顯上帝係宇宙的主權者。自然的災難，目的是要人回歸道德的純潔，「富仁慈愛心，致力於所有的情操與助人之能」。[79] 值得注意的是，How 的警示論、道德淨化論的目的卻與他支持英國的憲政現狀息息相關。他說，英國作為混合政權與新教國家，已是世上享有最穩定的政治社會與宗教自由的國家，因此

> 簡言之，我們是否是個富足幸福的民族，端看我們自己。但我不得不這麼說，不容否認的，雖然我們享有如此的優勢與恩寵，我們卻依舊是個憤懣、黨同伐異、不知感恩、分裂的民族。因此，我們許多的幸福或被流失或被摧毀了。[80]

表面上看，從里斯本大地震轉到對英國憲政的支持，似乎需要很好的想像力才能輕易完成聯結。但這對國教者而言，似乎不那麼難。首先，How 論證就如同絕大多數的宗教家或道德家一樣，將個人修身視為社會安定的基礎。再者，How 的佈道是在 1756 年 2 月 6 日。英王喬治二世宣布這一天為齋戒日（Fast day），當日許多佈道主題都與里斯本大地震有關。其中有些佈道則提醒信眾們，英國與法國的海外殖民戰爭（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63）一觸即發，因此應當凝聚英國人的認同與提倡無私的德性。Thomas Edwards 就在他的證道辭裡對此二者做了清楚的聯結與說明。Edwards 說，里斯本大地震之前不久，倫敦也發生過地震。此外，世界各處也不時傳來地震的惡耗。

> 這些事件代表了神意降臨的極度警告。確實，這是我們當從睡夢中清醒的重要時刻。除非我們要含恨沉淪，與所有人一同喪命。[81]

緊接著，Edwards 直截地說，另一個令我們不得不儘快悔悟的原因是英國即將與法國開戰：「我們似乎到了與一強大民族開戰的前夕。它不只強大，也善於權

78 James How, *A Sermon on Occasion of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Rivington, 1756), p. 6.

79 How, pp. 11-15.

80 'In short we want nothing to make us a flourishing and a happy nation, and we are actually so in everything but ourselves; and it cannot be denied, what I am sorry to mention, that under the Advantages and Blessings we enjoy, we are, notwithstanding, a discontented, fractious, ungrateful, divided people, and that much of our Happiness is eclipsed and destroyed by it.' How, p. 18.

81 'These are very alarming 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 *It is now,* truly! *high Time* for us *to awake out of sleep*, lest *Iniquity be our Ruin,* and *we all likewise perish.*' Thomas Edwards, p.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謀與背叛。」[82]

> 只有上帝才是所有勝利的授予者。因此，倘使沒有祂神聖的祝福，我們無法擊潰、對抗敵人邪佞的計謀。讓我們轉向祂，只有祂會為我們而戰。全能者即將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成為虔誠的悔悟者，在祂身上獲得終勝。[83]

Edwards 祈求民族的道德淨化可以讓上帝特別眷顧英國人。換言之，他是在祈求上帝的特別恩典或神恩。其實，如果這樣的神學意見為真，里斯本大地震其實就是上帝特別降禍、懲戒葡萄牙人。同樣的，Pennington 也認為，回顧、反思里斯本大地震，只會讓英國人更加體認到上帝對這民族的祝福。因為特別神恩的眷顧，英國擁有「好土地」、「好政府」「純正的教會」。[84] 而且，「當別的民族遭受祂親手造成的大災難（*尤其是眼前這個*）的時候，英國人卻生活在安穩之中。」[85] 我們不妨如此論斷，Pennington 以及其他類似的特殊神恩見解，已經浸浸然有上帝選民的意味。

總之，1756 年初，英格蘭教會人士集體地，有意識地將里斯本大地震與即將爆發的英法戰爭做宗教上的連結，訴諸英國人的民族情感、道德焠鍊、以求特殊神恩的眷顧。Moss 的一段話很能說明當時國教復興的風潮。

---

82 ‘We seem to be upon the Eve of a War with a very powerful Nation: and not only powerful, but politic and treacherous too.’ Thomas Edwards, p. 21.

83 ‘As God alone, therefore, is *the Giver of all Victory*, as without the divine Blessing,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defeat and battle the perfidious Scheme of our Enemies, let us *turn* to Him, who alone fighteth for us; and, by becoming sincere Penitents, let us prevail upon the Almighty to be with us.’ Edwards, p. 21. Richard Terrick 在 1756 年 2 月 6 日於英國國會的一場佈道會主題設定在為英法戰爭禱告，期勉國會議員以身作則，淨化修身以求上帝的眷顧。但他很有意識地以災難、原罪、神意等等為里斯本地震佈道的通用語言。筆者認為，Terrick 應該是有意相互挪用這些語言佈道。Richard Terrick,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Commons at St. Margaret's Westminster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Jon Shuckburch, 1756).

84 ‘Add to this, that we have many other Instances of God’s Goodness to us, (in which few Nations equal us, none excell us) which demand a grateful and suitable Return to him that gave them. We have a *good Land*, affording what is useful for the Support and Comfort of Lfe, *a good Government* , under which we have as great Liberty, as any Subjects can have consistent with a reasonable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a pure Church*, reformed from Idolatry and Superstition.’ John Pennington, pp. 13-14.

85 ‘And in many Great Calamities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t One,*) when other Nations have suffered under the Severity of his Hand, we, through the same Goodness, are yet in Safety.’ Pennington, pp. 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可是，我們所遭遇的威脅信號，並不只有最近頻繁、具毀滅性、警示性的大地劇烈抽搐。上帝的審判已經離我們更近了一點。戰爭之劍已經出鞘。血腥的旌旗已經揚現。神恩在我們面前擺上敵人，他們的工藝與國力在在值得戒慎。這是個具野心、有企圖、權謀、陰險、強大的敵人。他們為了自己的欲想，而讓歐洲顫動（tremble），而且不只一次準備枷鎖，想要加諸在他們所忌妒垂涎的島上的自自由精神者身上。如果主站在我們這邊，就讓我們在此次事件裡免於痛苦，讓我們對人所施加在我們身上的事，沒有懼怕。[86]

法國的宣戰是另一種形式的地震。正如同最近頻仍出現的地震，法國時常令歐洲震盪。但是，正如地震是上帝，第一因所擺上的，戰爭也是上帝的目的手段而已。英國宗教輿論相信，正如英國始終沒有受到地震的摧毀，在這場即將開打的戰爭中，上帝的特殊神恩會再次眷顧英國。

雖然英格蘭的公共讀者最常接觸到的地震解釋依舊是傳統神學觀點；但這並不表示傳統的解釋格套一成不變。最明顯的論述變化，是此時牧師們顯然努力想與當時的科學語言相結合，創造出新的宗教語言，甚至形成對基督教的自然觀的新解釋系統。查理士衛斯里的哥哥，亦即創立衛斯理公會的約翰衛斯里（John Wesley）曾對里斯本大地震提出神學看法。正如同許多其他宗教人士，約翰衛斯里反對將地震看作「完完全全的」自然現象。衛斯里相信，自然之所以有秩序，是因為背後有個更高的智慧者（的意志）在控制。1756 年距離哈雷（Edmond Halley）預測哈雷彗星回到太陽系只剩兩年。衛斯里於是表示，里斯本地震出現前所未有的巨浪，或許是哈雷越來越接近地球的結果。他續論道，如果上帝未把哈雷彗星導向地球以外的軌道，地球就會遭受撞擊，成為火球。言下之意，我們應該相信上帝必然會避免讓哈雷彗星撞上地球。此外，雖說英格蘭輿論的宗教色彩濃厚，這卻並非表示在英格蘭完全找不到對里斯本大地震提出科學性觀點的文本。出身劍橋的牧師密歇（John Michell）在 1760 年發表了《對地震成因的臆測與對地震現象的觀察》一書。他曾經在皇家學會（the Roy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6 ‘But the violent Convulsions of the Earth, that have of late been so frequent, destructive, and alarming, are not the only angry and threatening Symptoms that attend us. The Judgments of God are yet nearer to us. The Sword of War is already unsheathed, and the bloody banner displayed. Providence raised us up an Enemy, at whose Arts and Power we have just Cause to be alarmed. One that is ambitious and aspiring, politic, insidious and powerful; that has made Europe tremble for her Liberties, and more than once prepared the Yoke, for the freeborn Spirits of his envied Island. … If the Lord be on our Side, let us be in no Pain for the Event, nor fear what Man can do unto us.’ ’Charles Moss, *A Sermon*

Society）多次宣讀他的理論。密歇對於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英國殖民地地區的地震知之甚詳。例如他統計道，從 1746 年 10 月 28 日至 1747 年 2 月 24 日，利馬（Lima）總共出現 451 次（有感）地震。他綜合各地的地震現象，尤其是牙買加（Jamaica,1692）、西西里島（Sicily, 1693）、利馬以及 1750 年的倫敦地震等現象，提出對於地震成因的猜測。[87] 他認為地底下藏有大量的火與水。水火交融後產生了鉅量的水氣；水氣爆發後產生了地震。因為是水這種物質造成了地震，所以地震時地面的連續隆起才會呈現波浪狀的型態。[88] 里斯本大地震也佐證了他的理論，因為有目擊者紀錄了當時葡萄牙的海岸線出現了「煙與些許的火焰」；而地震時，人們也聞到了從海邊漂來硫磺味與霧。[89]正因為是這個原因，我們會發現火山附近地區出現地震的頻率比較高，而且再發生率也相當「穩定」常見。[90] 密歇的觀點大概是當時英國最被廣泛討論的地震科學解釋了。只是密歇本人對後世的神學、科學、大眾信仰的影響都相當有限。

四、蘇格蘭思想界對里斯本地震的回應

相較於英格蘭社會，尤其是宗教團體對於里斯本大地震的關注，蘇格蘭社會對此次事件幾乎沒有任何公共評論；甚至連宗教界的佈道會都甚少提及。[91] 蘇格蘭智識界在此一事件的討論中幾乎完全缺席，此事的確是值得推敲。1755 年前後正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高峰。十八世紀上半葉的經濟成長較諸十七世紀末成長了四倍有餘。中產階級與貴族在土地開發、土地改良、城市建設上有極為顯著的進展。在此之前，第一代的新學術人物都已經發表了他們最重要的著作：例如代表史學的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0）與休姆，代表哲學界的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與休姆，代表法學界的坎姆子爵

(London, J. Whiston & B. White, 1756), pp. 12-3.

87 John Michell,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Cause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Phaenomena of Earthquakes* (London, 1760), p. 13.

88 Michell, pp. 6-10. 文章內容後來也在英國皇家學會的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發表。

89 Michell, p. 13.

90 Michell,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Cause,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Phaenomena, of Earthquakes*, pp. 25-6. 在此之前 Thomas Lydyat 的 *Philosoph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Fountains* 以及 Simon Patrick (pp. 6-7)等人都支持水氣對於地殼運動的影響。

91 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尚未找到任何一篇在蘇格蘭發表的證道詞提及里斯本大地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nry Home, 16-17）等等。史密斯也已經在愛丁堡及格拉斯哥大學任教。他的法學課程講義後來出版，證明這些課程對下一代的學術影響甚深。他在《國富論》裡講述的許多重要觀念，例如勞力分工理論，已經見諸此時的法學講義。1755 年，《愛丁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發行。雖然只維持了兩年，但也足以證明蘇格蘭的智識界與出版文化將展開新氣象。然而正值里斯本地震發生前後所刊行的《愛丁堡評論》似乎不曾有隻字片語提及這次災難。1771 年第一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在蘇格蘭發行，但《大英百科全書》中的〈里斯本〉條，也未提及此次地震。[92] 相較於《大英百科全書》的不聞不問，1754-1772 年出版的法國《百科全書》裡的〈里斯本〉條，則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談論此次大地震的始末與影響。[93] 此例似乎可以說明里斯本大地震對兩國輿論與歷史記憶的影響深淺有著極大的差異。

（一）看不見的地震

蘇格蘭人當然並非對里斯本大地震無所知悉。這個歐洲的世紀地震發生時，年輕的蘇格蘭建築家羅伯亞當（Robert Adam, 1723-92）正在羅馬遊歷，並且師從法國建築師克里梭（Charles-Louis Clérisseau）學習古典學派的建築學。羅伯亞當聽到地震消息後，寫信回家表示「里斯本地震的消息真是駭人聽聞」。不過，他接著道，「這大概是上天為我所做的審判。」他立刻加入葡萄牙國王的徵才活動，希望能成為重建里斯本城市的建築師。在另一封家書裡，他意氣風發地坦承他的雄心與期待：「若能讓一名親王任命為全世界的最佳人選，固然是值得驕傲的理想，但想一想未來幾年完成後的雄偉建築以及收入，那就更令人躊躇滿志……如果事情真的成功，我會被國王封為貴族以及足以與此頭銜相匹的財富，我將沒有對手；幾年後，我將住在氣候宜人並有許多蘇格蘭同胞的地

92 如果《大英百科全書》標示當時蘇格蘭社會對於知識的掌握程度，那該啟蒙社會對於地震的確所知有限。第一版的《大英百科全書》沒有〈火山〉這個條目，但有〈地震〉這條目。該條目簡單寫下：「地震，在自然史裡，是相當一大塊土地的劇烈跳動（agitation）或搖晃（trembling），通常伴隨著像閃電一般的可怕聲響，有時會有火、水、風爆發出來。」它請讀者繼續參考〈氣體學〉（Pneumatics）。以氣體概念來解釋地震是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傳統。此一傳統在十八世紀仍然廣為科學家所接受。Jean Paul Poirier,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Lisbonne*, (Paris: Odile Jacob, 2005), p. 81.《大英百科全書》的〈氣體學〉條目下說道：「氣體學是處理空氣的特質、重量、壓力及空氣升起的後果的科學。」但有趣的是，該條目並未談論地震。

93 很顯然地，法國百科全書之所以列入里斯本一條，是因為里斯本大地震。這也說明了百科全書的編輯希望知識可以呼應現實，隨著社會與歷史的發展而加入或改變知識的體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以人人欽羨的方式，頭頂著各種頭銜光環，回到英格蘭。」[94] 他以古典主義的風格以及劇場的結構，替里斯本規劃了重建的藍圖。最終，這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並沒有得到國王的招募；他夢想的頭銜與財富也一併落空。但是他在1762 年回到英國後，立刻成為國王的御用建築師，並且完成許多重要的建築計畫。[95]

羅伯亞當斯顯然過度樂觀，但原因不只是因為他年少輕狂，也是因為他有所憑藉才會如此躍躍欲試。在他前往羅馬遊歷之前不久，離他故鄉克卡地（Kirkcaldy）不遠的愛丁堡就曾經有過一次難得的造鎮經驗。羅伯亞當的靈感與信心的來源，應該與故鄉的背景有關。隨著蘇格蘭的經濟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持續而穩定的發展，許多以「精英社」（Select Society）成員為核心的貴族與城市管理階級如牧師、律師、教授等人希望改善愛丁堡城市的居住品質，以適合逐漸興起的中產階級的需求。他們希望在舊城北邊打造一個新城，以便與下層市民的日常生活圈有所區隔。1752 年，艾略特（Gilbert Elliot，Lord Minto，1693-1766）便以精英社的名義發表了〈愛丁堡居民、產業促進計畫芻議補充〉（*Supplement to the proposal fo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the trade and riches of the city of Edinburgh*），正式替這個歐洲第一起城市造鎮計畫鳴槍開跑。羅伯亞當的哥哥約翰亞當（John Adam，1721-92）、弟弟詹姆士亞當 （James Adam，1732-94）既都是建築師，也都是精英社的成員。因此羅伯亞當對這個計畫應該知之甚詳。愛丁堡新城計畫背後的最大贊助者，同時也是啟蒙時代對蘇格蘭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阿吉爾公爵（the 3rd Duke of Argyll）。而人在羅馬的羅伯亞當，則冀望阿吉爾公爵能替他向葡萄牙國王保薦。[96] 不過，羅伯亞

94 轉引自 Angela Delaforce, “The Dream of a Young Architect: Robert Adam and a Project for the Rebuilding of Lisbon in 1755,” in Angela Delaforce (ed.) *Portugal e o Reino Unido: A Aliança Revisitada* (Lisbon: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 1995), p. 56.

95 羅伯亞當在 1780 年代，為愛丁堡設計許多建築與地區發展圖，成為現今這座城市風貌的重要打造者。除了在新城有他的作品，他也是現今市政廳以及愛丁堡大學法學院的設計者。此外他在倫敦、巴斯（Bath）也留下一些經典作品。相關歷史可參考 A. J. Youngson, *The Making of Classical Edinburgh 1750-184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11-31。羅伯亞當過世後被葬在倫敦西敏寺。抬棺者包括巴可魯公爵（Duke of Buccleuch）、科芬伯爵（the Earl of Coventry）、羅德岱爾伯爵（the Earl of Lauderdale）、史托蒙勳爵（Viscount Stormont）、甘保子爵（Lord Frederick Campbell）等人。換言之，他年輕時冀望因建築專業而譽寵榮身的壯志並未完全烏有。只是他的榮華不在異鄉而在故國。

96 Angela Delaforce, “The Dream of a Young Architect: Robert Adam and a Project for the Rebuilding of Lisbon in 1755.” 一般人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印象，就是它的思想裡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的年輕之夢並沒有實現。隨著他個人應徵失利，原已細如蠶絲的蘇格蘭啟蒙與里斯本地震的關係，如今更添一抹遺憾。

對照啟蒙思想家對地震事件所引發的科學與哲學思考，葡萄牙社會，尤其是執政者的反應顯然非常務實。據說，雖然葡萄牙國王荷西一世大公（Dom José I）因為地震當日出城而免於災厄，但他仍然受到了極度的驚嚇，並且此後終生拒絕睡在石頭建造的房子內。[97] 當時的首相彭博（Marqués de Pombal, 1699-1782）則在災後立刻下令搬運屍體掩埋，並派遣軍隊進駐里斯本，將許多在災難中趁火打劫的人一律處以絞刑。此外，他還設計了有十三道問題的問卷，詢問地震時發生的時間、傷亡人數、異常現象、潮汐變化等等。[98] 值得一提的是，彭博後來取用了三位建築師與都市計劃人才，分別是葡萄牙境內的首席工程師麥亞（Manuel de Maia）、極具天分的中校馬德（Karoly Mardel）、以及才能出眾的中尉桑多斯（Eugenio dos Santos）。Maia 當時已年屆八十歲，擅長防禦工事的建築，也是十八世紀西班牙矯飾主義在葡萄牙的代表人物。Mardel 六十歲。他在 1733 年從匈牙利移居蒲國，代表了中歐的風格傳統。Santos 當時才四十歲，代表了新時代與新品味。[99] 彭博將建設方針定調為擴大主要街道；這使得原先的中世紀主城被換裝成帶有巴洛克風格的城市風貌。[100] 綜觀羅伯亞當一生的建築設計，大抵屬於線條較為陽剛且簡易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或許他之所以未受青睞，是因為葡萄牙主事者不喜新古典主義。但是，如果羅伯亞當代表

市民社會性格或對市民社會概念的闡發。這種印象並不算錯。可是一個思想的運動必然要有經濟與制度的建構做基礎，而這個基礎常常與英國的貴族社會或統治條件分不開。關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基礎以及物質資源，請參考 Roger Emerson, *Academic Patronag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Glasgow, Edinburgh, and St. Andrew's Universit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hn M. Simpson, "Who steered the Gravy Train 1707-1766," in N.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 (eds.) *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7-72. 單就阿吉爾公爵的事蹟，亦可參考 Eric Cregeen,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House of Argyll," in N.T. Phillipson and Rosalind Mitchison (eds.), *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23.

97 Kenneth Maxwell, Lisbon 1875: The First 'Modern' Disaster (but if modern, how is it so?), http://74.125.47.132/search?q=cache:b8eoIginyEwJ:www.clpic.ox.ac.uk/doc/5.doc+scotti, p. 6.

98 Maxwell, p. 7.

99 Jose-Augusto Franca, "La Lisbonne du Marquis de Pombal: ville des lumieres," in X. Malverti (ed.) *Collection Villes et societes* (Paris: Picard editeur, 1997), p.184.

100 Ibi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蘇格蘭社會的里斯本大地震的「經驗」，這經驗顯然與葡萄牙社會自己的務實關懷相通。[101] 這經驗是蘇格蘭的，卻也是葡萄牙的。但實務態度之外，與英格蘭、法國、德國的論述經驗相同不同的是，我們幾乎找不到「蘇格蘭的」里斯本地震論述。

1761 年，離羅伯亞當鎩羽而歸已有五年之久。蘇格蘭社會對里斯本大地震的集體記憶原本就似有似無，如今只能更是薄如輕霧。不過，這薄霧卻如同蘇格蘭冬天的雲霧，終日撫罩在蘇格蘭的重要心靈裡。羅伯亞當本人在這一年整裝從義大利返回英國。與此同時，他的童年玩伴[102]——亞當史密斯突然在他的《道德情思理論》裡拋出一個令人不安的道德情境。史密斯說：「讓我們假設，偉大的中國（支那）帝國及其廣大的居民，在一夕之間被地震所吞沒」，那我們會怎麼做？[103]這個問題雖然看似與里斯本大地震無直接關涉，但卻較諸羅伯亞當對大地震的現實反應更能體現蘇格蘭啟蒙對於災難的反思。由於此段文字相當關鍵，筆者先行將整段文字節錄如下，以利後續討論。史密斯說：

> 讓我們假設，偉大的中國（支那）帝國及其廣大的居民，在一夕之間被某個地震所吞沒。現在讓我們想想，一個富有人道胸懷，卻與那邊的世界毫無瓜葛的歐洲居民，在得知如此令人聳然的災難之後，會受到何種影響。我猜想，他首先會強烈表達他對這群不幸之人的哀傷，他會對人類生命的多舛、人類之意圖與作為的浮妄做出憂傷的反思，畢竟那些作為在一瞬之間就化為煙塵。如果他是個投資客，他或許會思考這災厄對歐洲商業，或全世界貿易的影響。當所有這些細緻的哲思結束之後，當所有的人道情懷都適當地表述了之後，他終將繼續追尋他的事業或快樂，再度拾起從前寧靜、從容的休閒生活，彷彿那事件從未發生過。[104]

1976 年牛津大學出版的《道德情思理論》裡，編輯們在這一段文字加上一小段

101 筆者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雖然不乏新思想、思維的創新，可是它也可能比法國、德國啟蒙更注重務實的建設。原因之一是該啟蒙社會的菁英非常強調模倣的重要。但這是個相當大的假設，需要專文處理才合適。

102 史密斯與羅伯亞當的大哥約翰亞當是小學同班同學。這兩家子的成員彼此都極為相善。Ernest C. Mossner & Ian S. Ross (eds.),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p. 125.

103 之所以說「突然」，是因為一七五九年初版的《道德情思理論》並無此條意見。史密斯是在一七六一年的再版裡加入這項論述。

104 Adam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76), pp. 13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注釋，認為此一地震的比喻「應當本自 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105] 筆者同意編輯們的注解。可是編輯們來不及解釋，為何史密斯不直接以里斯本大地震為實例來分析、陳述他的道德原則？以「中國」取代「里斯本」顯然是個修辭。此一修辭的目的為何？為何是中國，而非其它國家？

「為何是中國而非他國？」: 因為對當時的英國與歐洲而言，中國是最重要的非歐洲文明；因此，話語若聯結到想像的中國或中國的想像，就是聯結到重要的國家與文明。如此，既能烘托災難的嚴重性，也能對照出人類的被動情感是如何的贏弱。英國對中國貿易的需求從十八世紀初伊始，有增無減。在逐漸取代西班牙與荷蘭成為東亞的海上強權之後，英國對中國的興趣更形增加。隨著對印度內部的綏靖與征服，英屬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需求則更為孔急，因為英國長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致使東印度公司白銀短缺，而嚴重影響在印度的募兵。[106] 隨著貿易的「渴望」與日俱增，中國也逐漸在英國文學裡成為在想像上十分很親近、重要的國家。許多當時的英國文人寫下了與中國文學、社會相關的作品。例如當時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Horace Walpole 在 1757 年寫了一篇小文名曰《在倫敦的中國哲學家蘇和寫給北京朋友連知的一封信》。[107] 此文藉由「中國智者」的眼光觀察英國社會的風俗，等於是假借異文化視角提出對自身社會的批評。此種虛擬書信文類早已出現在孟德斯鳩的《波斯書簡》（*Lettres Persanes*）裡。[108] 只是在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英國，「中國智者」凌駕了「波斯智者」成為文學家託言自況的虛擬身份。1760 開始，愛爾蘭出身的文學家 Oliver Goldsmith 在報刊《公共石板》（*Public Ledger*），連載了想像式的中國書信。主人翁連知阿堂吉（Lien Chi Attangi）是位湖南出身的清朝官員與哲學家。他旅行到歐洲與英國並從英國發信給他的中國友人，點評他在英國的所見所聞。Goldsmith 以 Lien Chi Attangi 為名，當然是有意承 Horace Walople 之

105 Smith, p. 136.編輯者為哲學史名家 D. D. Raphael 以及 A. L. Macfie。牛津大學出版社在 1976-8 出版了史密斯全集。因為編輯群多由格拉斯哥大學的學者們所組成，因此又稱之為格拉斯哥版本。

106 當然，這急迫性要到一七五○年代後期，開始顯露，所以史密斯在寫作《道德情思理論》時，中國在英國一般人的想像裡只有重要性而尚未有急迫性或往後因為急迫性而的迸發的敵對性情緒。北美獨立之後，直接迫使英國必須比較強勢地要求清廷准許英國與其治下的民間有自由貿易，以彌補北美市場的損失，種下往後兩國敵對的遠因。

107 Horace Walpole, *A Letter from Xo 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 Chi at Peking* (London: printed for N. Middleton, 1757).

108 因為此文類的批判味道，孟德斯鳩於 1721 年很低調地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此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緒，讓這類中國書簡成為英國文學的傳統。1761 年，三十一歲的「文學評論家」Thomas Percy 出版了兩卷有關中國文字與戲劇小說的書籍，《與中國相關之雜文》。[109] Walpole, Goldsmith, Percy 等人都是當時倫敦文壇甚為活躍的作家。[110] 這些文學創作說明了，就在史密斯寫作《道德情思理論》的時刻，「中國」是個流行的概念。曾經在愛丁堡大學教授過修辭學的史密斯，當然知道英國文學裡的中國想像對公共讀者的影響。而在這樣洵美的想像世界裡，史密斯的「想像中國災難」反倒更能顯示出戲劇張力。當然，在蘇格蘭啟蒙裡鼓吹中國文明最力的作家，仍是史密斯的好友，哲學家休姆。早在 1760 之前，休姆便在許多文論裡強調中國文明的獨特與成熟，並舉之與西方文明作為對比。[111]史密斯的中國災難與休姆的獨特中國文明論就成了相互呼應、滲透的文本，襯托這個想像的地震對於人類文明所可能帶來的重大破壞。對休姆而言，中國與希臘是兩個不同文明的代表。蘇格蘭啟蒙對於希臘文明情有獨鍾，尤其是對希臘戲劇表以極高的崇景。當時文人甚至以「北方的雅典」來稱呼愛丁堡。正是因為希臘文化的再度擅場，使得中國戲劇也受到歐洲文學界的青睞。例如「趙氏孤兒」的故事就被多次編寫成悲劇。1755 年 8 月，也就是里斯本地震的前兩個多月，巴黎首度上演了伏爾泰以程嬰杵臼的故事所編寫《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戲劇，造成相當大的轟動。同年，史密斯在甫創刊的《愛丁堡評論》上撰寫一篇文學評論，大加讚賞伏爾泰的《中國孤兒》。[112]前述 Percy 的《有關中國的雜文》裡，也收有〈趙氏孤兒〉的英文劇本。對史密斯的密友休姆而言，雖然中國無法在科學上與希臘文化相匹，但她更像是個專門為文學家而建造的

109 Thomas Pe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2vols; London: printed for R. and J. Dodsley, 1761).

110 Horace Walpole 是當了英國數十年首相的右翼輝格黨人 Robert Walpole 之子。他本人也被封為伯爵。《道德情思理論》甫出版，休姆就從出版商處拿了幾本新書給當時的達官貴族，其中一位就是 Horace Walpole. 而 Goldsmith 與 Percy 後來都加入了倫敦當時著名的精英文人團體「俱樂部」（The Club）。此文人社群係由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首任院長 Jesoph Reynold 以及英國當時的文壇祭酒 Samuel Johnson 於 1764 年所發起，至 1770 年代，成員也還只有二十幾位。Goldsmith 與 Percy 是在 1760 年代進入這個團體。 Smith 是在 1777 年被提名進入這個團體。這團體的其它聞人還包括英國保守主義的理論奠基 Edmund Burke，出使中國的馬嘎爾尼等人。現今都柏林的三一學院正門有兩座銅像，分別就是 Goldsmith 以及 Edmund Burke。

111 David Hume, "National Character" in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ndianapolis : Liberty Classics, 1987).

112 Adam Smith, "Letter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in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 25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尤其是 1776 年，史密斯在他的經典著作《國富論》裡表示，中國的生產力為世界之冠，故而其價格最低，技術最優；因此與中國的貿易對於英國最為有利。總之，在休姆、史密斯的文學世界裡，中國是當時同時孕育精緻文化的強大經濟帝國。在歷史想像與文學想像裡，史密斯喻說中國地震，也等於是喻說希臘文明在一瞬間之間在眼前轟然傾頹。文學或寓言是以已知來引導對未知的感悟，如果希臘文明的消失是足以令歐洲人掩卷嘆息的史頁，史密斯的中國地震當然同樣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毀滅。[113]

史密斯之所以選擇以中國作為想像的對象，顯然也與「地理距離」因素有關。歐洲人對未曾謀面素不相識的中國人的苦難，很難掬同情之淚，頂多只是對人類的困境做一般性的沉思與感慨：「可是，如果他未曾見過中國這些人，他倒是可以與億萬人類同胞的廢墟一起安穩地鼾睡到天明。」反之，越是熟識，同情心（sympathy）則越強。葡萄牙雖然因為恪遵天主教而受到英國的訕笑排擠，但他畢竟是歐洲-基督教文明。例如前述某些宗教證道辭就特別強調葡萄牙作為基督教的一員，因此特別鼓勵英國信眾對於里斯本大地震要有足夠的慈憫。一份當時的佈道辭呼籲英國人將里斯本地震想像成倫敦大地震，藉此來移情、感同身受：「想像[我們]這王國的首府夷為平地；其崇美的教堂、壯麗的建築、無盡的財富都埋在堆礫之中……豈有任何心腸可以硬到只關懷自己，而對*同*一社區人的深刻苦難毫無人道與溫柔的感受？」。[114] 這份強調移情的證道辭，恰巧可以用為史密斯選擇中國做為災難的發生地，下一個的註腳。強調移情者，必須將里斯本想像成倫敦，而只有讓里斯本消失，讓中國出現，史密斯

113 其實，中國在歐洲人的地震文獻上原本就是常客。耶穌會教士記載了許多次發生在中國的地震。伏爾泰在耶穌會士所辦的學校受教育，他因此對中國事物感到欣羨與好奇，其中還包括了地震。他在批判詩《詩論里斯本災難》的并言裡就以三場地震作為開場：里斯本大地震、利瑪（Lima）大地震以及 1699 年的中國地震。史密斯對伏爾泰的文字非常孰悉，多次撰文讚揚「中國孤兒」（除了《愛丁堡評論》，亦見於 Adam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227.）。可以想見史密斯應該也讀過伏爾泰的《詩論里斯本災難》。

114 'And surely *so dreadful a Calamity* (the most dreadful to which human Nature is exposed) *cannot fail of affecting the Hearts of all Persons, who have any Sense of Religion or Humanity*. … Imagine you have seen the Metropolis of *this* Kingdom leveled to the Ground, all its magnificent Churches, stately Edifices, and immense Treasures, buried in Ruins: … … Could any Breast be so contracted within itself, as not to admit some Feelings of Humanity and Tenderness, when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Community with ourselves are suffering so deeply? ---- And what, shall we steel our Heart against the Exercise of this Sympathy, because Lisbon, and not London, is the seat of Desolation?' Samuel Clark, pp. 1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才能達到讓讀者「離情」的效果。對英國社會而言，中國似近實遠。她是文學家筆下的美好國度，是史密斯筆下的生產大國，但她畢竟是非基督教國家，與英格蘭不屬於同一個社群。

對史密斯而言，里斯本大地震的意義不在原因，而在於結果。但史密斯選擇以想像的中國地震而非當時的里斯本大地震，顯然是有意的修辭選擇。地震在當時因為里斯本事件而成為歐洲集體記憶的鮮明部份。它代表自然災難最鮮明、最恐懼的臨在。中國卻代表切實生活中最遙遠、最模糊、最不具親近也不具侵害性的對象。這兩個概念的結合產生一個特殊的概念空間，讓災難意象既鮮明又一般。因此，「中國的里斯本地震」讓災難得以一般化了，而不必與上帝的特殊神恩勾聯在一起；也因此史密斯得以討論面對災難的一般道德情境。以下將繼續討論，對災難採取一般化的理解，也同樣見於其他蘇格蘭啟蒙作家如休姆與佛格森等人身上。

（二）里斯本地震意義的一般化

在歐陸，里斯本大地震促成科學態度的昂揚，或引來諸方對神學意見的詰難與援辯。但是在蘇格蘭，有關地震科學的研究與里斯本地震似無直接關係。十八世紀蘇格蘭地質學的重鎮應該是非哈藤（James Hutton, 1726- 1797）莫屬。哈藤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地質演化的概念。換言之，土地或地質也有歷史。可是哈藤的論證方法完全無涉歷史事件。[115] 或許，比較精確的詮釋應該是，蘇格蘭思想界習慣以一般化、哲學化的語言、方式分析事件的一般意義。就如同史密斯在反思災難所產生的道德困境時，有意識地避免討論實例，其他許多蘇格蘭啟蒙的標竿型人物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與論述風格，例如休姆、佛格森、布萊爾等思想家。里斯本地震作為新聞、歷史課題，非他們所關心。此地震作為科學或物質的分析對象，非他們所長。里斯本地震作為神恩與災難議題，則俱見於他們的哲學思考。休姆雖然曾對宗教發表重要的文獻，卻隻字不提歷史上的事件。從1753起，蘇格蘭長老教會就陸續警告休姆，並對其宗教言論提出嚴厲批評。長老教會的宗教法院甚至在1756年安排了聽證會，打算將休姆逐出教會。[116] 儘管如此，休姆依舊持續發表他對宗教與信仰的看法。1757年，休姆出版了《宗教的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本書的寫作期間在1751-52間，因此不可能對里斯本大地震有任何回應。與此同時，休姆著手進行《關於

115 James Hutton, *Abstract of a Dissertation read at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 Concerning the System of the Earth, its Duration and its Stability* (Edinburgh?, 1790?).

116 E. C. 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36-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然宗教的對話》（*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的寫作。事後證明，此書較諸其他同性質作品，影響更為深遠。更重要的是，該書經歷兩次修訂，分別是1761年以及1776年。[117] 按理說，里斯本地震所引起的宗教或神學論辯，休姆應該是再熟悉不過。更何況休姆同時與伏爾泰、盧梭都有私誼。[118] 因此，休姆對里斯本所引發的宗教爭論應該不只有文獻上的了解，更有個人或第一手的親切感。但是休姆完全迴避這些相關人事。

無論是里斯本地震之前或之後，休姆始終以一般性的論證語言，提出他對信仰的心理分析。其實，休姆對宗教心理的分析與態度相當清楚且一致。休姆在《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採取了伏爾泰的立場，承認人類生命的苦難。但他並非以苦難來質疑神恩，而是，正好相反，以苦難來解釋宗教信仰的起源。對萊布尼茲以及波普這些自然神論者而言，上帝或神恩存在與世界整體的美與善是並存，或者是一體的兩面。伏爾泰以里斯本的苦難來質詰這個宣稱。休姆則找出這兩組論點的矛盾共生—苦難引發了宗教信仰。換言之，宗教與信仰的基礎在於感性而非理性。對休姆而言，自然神論者想以對自然的理性理解來彰顯神恩，從出發點來說便是個錯誤。休姆對話錄裡藉由 Philo 這個角色論道：既然上帝代表「正義、慈悲、憐憫、嚴正」（Justice, Benevolence, Mercy, and Rectitude），同時具有智慧與權柄，但人類卻不幸福（Happiness），這就表示上帝不願賜給人類幸福。所以自然神論者將上帝視為慈善，將神的世界計畫或神恩視為終極而整體的善，是詭異且缺乏經驗事實的前提假設。[119] 休姆甚至大

117 休姆生前即打算出版此書。但好友亞當史密斯勸他暫緩。休姆臨終前託囑史密斯在他死後立刻出版；但史密斯選擇扣住文稿，遲到一七七九年才出版。這可以反映史密斯對宗教議題的敏感與謹慎。參見 John Valdimir Price, 'David Hume's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Composition and Publication,' in A. Wayne Colver and John V. Price (eds.) *David Hume on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5-28.

118 後來因為細故，休姆與盧梭交惡。但休姆與伏爾泰則一直保有惺惺相惜的友誼。有關休姆與盧梭的過從，請參考 *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pp. 507-32.

119 "But not to insist upon these Topics, continu'd *Philo*, tho' most obvious, certain, and important; I must use the Freedom to admonish you, *Cleanthes* [作者按: 此為對話錄中的三位主角之一，代表堅信自然神論的神學意見者], that you have put this Controversy upon a most dangerous Issue, and are unawares introducing a total Scepticism into the most essential Articles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Theology. What! No Method of fixing a just Foundation for Religion, unless we allow the Happiness of human Life, and maintain a continu'd Existence even of this World, with all our present Pains, Infirmities, Vexations, and Follies, to be eligible and desirable! But this is contrary to every one's Feeling and Experience. It is contrary to an Authority s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膽的質疑道，與這些自然神論者的宣稱正好相反，我們可以假設，人類的苦難（而非幸福）與上帝的存在是正相關的。[120]

現代史家多數同意，休姆的宗教論述主旨不在提倡無神論或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毋寧是提醒信仰的本質在於情感而非理性。[121] 然而有意思的是，休姆的呈現方式較諸伏爾泰卻更加溫和理性而不煽情。他不像伏爾泰，利用具象的、新聞性的話題如里斯本大地震者，來幫助其言論的傳佈與渲染力。伏爾泰的里斯本論述帶有強烈的宣傳性與挑釁。這是伏爾泰有意為之的寫作風格與策略。反之，休姆的《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完全以普遍的語言陳述他的宗教理解。尤其是書中以對話錄的形式表現，讓不同觀點有交涉、互為主體的可能。反之，伏爾泰的詩論，完全以第一人稱表達主觀與強烈的情思。[122] 我們似可以確切地說，休姆所代表的蘇格蘭啟蒙是更溫和、更哲學化的思想創新。從另一個角度講，誠如上述，在里斯本地震之後，正統新教的福音、末世、特別神恩等措詞與宣道，鋪天蓋地而來，這對自始至終不只反對奇蹟，甚至反對上帝作為真理的休姆來說，絕對不是發表任何相關意見的好時刻。其實，《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的寫作早在1750年代就開始。休姆生前幾次想要發表，都被亞當史密斯勸阻。休姆在著作中選擇以概化、對話的方式呈現他的論證，目的應該是希望他的論著能傳世，或歷時久遠一些。但自1750中葉以來的新教熱情顯然也影響了休姆與史密斯這些溫和思想家的發言與出版。

休姆的諍友亞當佛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企圖在後伏爾泰與後休姆時代，重建自然宗教的神學論點。在後休姆時代談神恩，恐怕很難完全不

---

establish'd as nothing can subvert." A. W. Colver and J. V. Price (eds.) *David Hume on Religion*, p. 229.

120 Ibid., p. 230.

121 Genevieve Lloyd, *Providence Lo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58. 本書對《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也有簡短卻精采的分析。請參考 Lloyd, pp. 265-74.

122 關於休姆的宗教思想可參考 David Norton, *David Hume: Common-Sense Moralist, Skeptical Metaphysici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比較近期的 Terence Penelhum, "Hume's Views on Religi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Elizabeth S. Radcliffe (ed.) *A Companion to Hum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p. 323-37; Martin Bell, "Hume on the Nature and Existence of God," in *A Companion to Hume*, pp. 338-52; Michael Levine, 'Hume on Miracle and Immortality,' in *A Companion to Hume*, pp. 353-70.關於休姆的懷疑主義以及其懷疑主義與其寫作策略及風格的關係，請見 Jerome Christensen, *Practicing Enlightenment: Hum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terary Care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去解釋，何以終極慈善的上帝會施予這世界以自然與人為的惡。佛格森早年曾擔任高地軍團的隨軍牧師。1745年高地叛變欲迎接被罷黜的斯圖亞特王朝的後裔回英國登基。佛格森本人擁護當時在位的漢諾威王室。他當時曾出版一份佈道辭，辭中使用傳統卡爾文教派的語言，認為此軍事叛變等於是民族災難（calamity）。而民族災難的成因，就是民族德性的墮落；因此，呼籲他的軍中信眾必須悔悟，改善自身道德。這樣的宗教教喻其實與我們前面所見，英格蘭宗教人士對里斯本地震的反應毫無二致。爾後，佛格森從辭去軍團牧師職位，過兩年到愛丁堡大學擔任道德哲學教授後，其思考專注於如何以概化或哲學化的語言，回復一般神恩在智識上的地位與合法性。與休姆以及英格蘭宗教人士不同的是，佛格森顯然希望在自然神論的基礎上理解神恩，並且回答社會或道德的現實問題。佛格森認為社會一如自然，有其規律。換言之，正如自然秩序為神意的表徵，人類或社會的集體活動，同樣是在上帝計畫的框架內進行。[123]個人擁有自由，歷史則無。佛格森在早年的〈氣流學與道德哲學講義〉的手稿中，曾企圖以死亡這種看似自然之惡的現象，來反證上帝的慈善與計畫。他認為，死亡看似惡，其實正是透過個體的死亡，使得人類甚至宇宙的生命整體得到生生不息的延續。這證明了神恩的終極慈善意圖。[124] 可是，佛格森最終似乎沒能將這一思考作出通融的結論，於是按住不發。相反地，在他發表的文字中，他特別強調人類道德行為的惡，以及惡的神恩／慈善意義。他企圖說明，上帝賜人以理性，因此得以反思人自身的惡以至於至善。

> 經驗了惡，會幫助[吾人]在未來做出更正確的選擇。透過有效地教導人類何事當為，終至於規範他們只做當做之事，或者將人類放置在更有智慧或更快樂的行事軌道上。[125]

換言之，他以道德而非自然秩序的理路，強調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人的責任；

123 Lisa Hill,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Dorecht: Springer, 2006), chapters 3 & 4.

124 "But in Nature every Species is preserved by Succession, & the Death of one Generation is not less a part in the order of Nature than the Birth or Succession of Another. In this Manner all Nature is continually Perishing & continually reproduced." Jeng-Guo Chen, "Providence and Progress: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Ferguson's Discussion of Civil Society," in E. Heath and V. Merolle (eds.) *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8), p. 178.

125 "The experience of evil tends for the future to inculcate a better choice; and, by teaching mankind effectually what they ought not to do, limit them at last to what ought to be done, or put them in the train of a wiser or more happy conduct." Adam Ferguson,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2 vols;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1995), p.234.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而對於自然的惡或災難，他選擇保持緘默。其實，在伏爾泰以及休姆的雙重攻擊下，在英格蘭排山倒海的新教運動下，想要承續自然神論以及一般神恩的傳統，討論上帝的慈善與世界秩序的穩定，絕非易事。這無疑是里斯本大地震對英國思想界的重要衝擊之一。

休姆論述策略與亞當史密斯借用中國地震的文學想像，甚至佛格森晚年對自然災難的緘默，代表了蘇格蘭智識界的思維與論述文化。他們避免陷入新聞性或政治性的爭端，而選擇以普遍性，有時帶有懷疑的語言，來表達他們對真理的看法與態度。許多當代思想史家同意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溫和性格。在里斯本大地震的思想爭論裡，這個判斷再次得到印證。[126] 從災難事件所表露的一般意義，而不從事件的新聞性，不從神恩的特殊性，或《聖經》語言來解釋災難或地震，是蘇格蘭十八世紀中葉的思想特徵。修·布萊爾（Hugh Blair, 1718-1800）是蘇格蘭有名的佈道家，同時也是愛丁堡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他對於地震的態度頗能代表蘇格蘭啟蒙思想對於「神意」、「示警」、「憤怒的上帝」、「上帝正義」、「天啟」、「末世」等等正統神學概念的懸置，甚至存疑。布萊爾表示：

> 上帝有權力在眾人之間製造宗教的印象。當閃電在天空中鳴竄，地震搖撼著大地，人們就會受到驚嚇，準備崇拜某個看不見的力量。可是這種印象只是偶而出現而且相當短暫。受過良好教育的心靈之所以能夠持續對崇高的存有者保持尊崇，是因為宇宙表現出無限的智慧。[127]

一如佛格森，布萊爾相信，認識基督教應該從自然秩序而不從異象，從一般神

126 Jonathan Israel,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oads to Modernity*: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New York: Knopf, 2004); Richard Sher, *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7 "It is the power of God, which produces among the multitude of men any impression of religion. When the thunder roars in the heavens, or an earthquake shakes the ground, they are struck with awe, and disposed to worship an invisible power. But such impressions are occasional and transitory. The lasting reverence of a Supreme Being arises, in a well informed mind, from the display of that infinite wisdom which all the universe presents." Blair, *Sermons* (1794), vol. iv, p. 442.布萊爾相信颶風或地震倒是文學想像的絕佳譬喻。"When a Poet is describing an earthquake or a storm, or when he has brought into the midst of a battle, we can bear strong hyperboles without displeasure." Hugh Blair, *Rhetoric*, (Philadelphia, 1784), p. 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恩而不從特殊神恩著眼。至少，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心靈」的宗教情知。里斯本大地震對布萊爾這樣的宗教見解應該是很不利的事件。這既說明了為何這些著名的溫和派長老教會人士會在里斯本大地震發生的時候，集體靜默。

五、結論

災難其實有區域及文化的獨特性格。里斯本大地震曾經在英格蘭造成極大的公眾迴響，原因之一，無疑是因為倫敦曾在1750年發生地震。而此一事件之所以在蘇格蘭相對少人討論，應該與蘇格蘭未有明顯地震有關。其實，英國，尤其是英格蘭最常見災難之所以是颶風。英格蘭是以海立國的國家，颶風對他們的傷害甚大，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必然有親近的關係。此外，「風」這個概念聯結了季節性變化與商業貿易的興歇循環。莎士比亞的《暴風雨》（*Tempest*）裡頭的巨浪、殖民、食人等等意象，戲劇性地表現出這個海洋貿易國家對於颶風的敬畏態度。1703年，英格蘭發生一起死傷慘重的颶風災情。《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狄孚對此發表了「災難剎那」的超越意義。他說，即使是古代那些企圖將自然裸露呈現在世人眼前，高舉理性火炬的巨人，仍舊在一陣自然的颶風之後，停留在漆黑的窄道之中。「因此在自然裡，哲學家的任務不是看透自然，不是到至高力量的曠野面前。……哲學家所不及之處，正是基督徒的起點。當這思索者將眼光投向穹蒼，再見了，哲學家；[穹蒼]畢竟超越哲學家所能作為的。」[128] 這次的颶風災難後來成為英格蘭的公共記憶的一部分。直到1735年，人們依然紀念著這次的集體創傷。曾經有位牧師就在佈道辭裡追思道：

> 正如同[《聖經》中]約拿的例子，我們今日所紀念的颶風，以及其它千百個可驚可歎的神意降臨，都應該會讓我們的心裡念著——離開上帝的道路或者對抗祂都是危險的。當祂憤怒的時候，誰能抵擋？……
>
> 當數千個可憐的生命一下子被帶離這個世界舞台，來到這位偉大法官面前受到可怕審判，大多數餘生者都會時時刻刻害怕被祂傳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8 “Thus in Nature the Philosopher’s Business is not to look through nature, and come to the vast open Field of infinite Power: … The Christian begins just where the Philosopher ends; and when the Enquirer turns his Eyes up to Heaven; Farewel[l] Philosopher; ‘tis a Sign he can make nothing of it here.” Daniel Defoe, *The Storm, or A Collection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asualties and Disaster which happened in the Late Dreadful Tempest, both by Sea and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G. Sawbridge, 1704), p. 6.

> 當中有許多人因為祂的介入而得救，他們那被驚嚇過後的心靈，就成為成就祂話語的器皿。[129]

英格蘭社會追念自己的颶風災難，震驚於1750年那場未造成傷亡的倫敦地震，都是可以理解的社會集體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蘭對災難的選擇記憶應該與它自身的民族意識發展有關。1737年，英格蘭殖民地印度（孟加拉）發生了造成三十萬人死亡的地震。但英格蘭社會卻少有人討論，這災難也不曾成為英國的集體記憶。[130] 英格蘭對孟加拉地震的淡然，自然讓我們聯想到史密斯的中國大地震以及他藉此所要表達的「被動情感」。但也同時更強烈地反照出，在里斯大地震之後的英格蘭宗教與輿論的集體反應。他們在面對災難時，反而更堅定新教信仰，更凝聚社群與民族的認同，更接受特殊神恩，甚至選民的觀念。簡言之，從災難中他們強化了（英國）人與神的特殊關係。雖然英格蘭的特殊神意、上帝審判觀，看似與伏爾泰對上帝正義的質問迥不相侔，它們其實都企圖說出「災難剎那」的超越意義。相對於此，蘇格蘭思想家繼續選擇以人與社會的角度，以一般化與理性宗教的思維面對里斯本大地震。或許，正如同往後的我們今日的現代世界，當時這些蘇格蘭啟蒙作家們早已放棄了對「災難的超越意義」的追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9 A. Gifford, *Serm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reat Storm, commonly called the High Wind, in the year 1703, Nov. 27 1734* (London: printed for Aaron Ward, 1734), pp. 5, 17.

130 Roger Bilham, “The 1737 Calcutta Earthquake and Cyclone Evaluated,” *Bulletin of Seismology of American Society* 84:5 (1984), pp. 1-10.

引用書目

一、一手文獻

Allen, Dr.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improved, as a Warning to Great-Britain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Fast-Day.*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56.

Anon. *Reflection Physical and Moral upon the Various and Numerous uncommon phenomena in the Air, Water, or Earth, which have happened from the Earthquake at Lima,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56.

Anon. *A Genuine Letter to Mr. Joseph Fowks, from His Brother near Lisbon, Dated November 1755 in which is Given A Very Minute and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Late Earthquake*. London: printed for M. Collyer, n.d.

Anon.. *A Letter from a Clergyman at London to the Remaining Disconsolate Inhabitants of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R. Griffiths, 1756.

Anon. *An Account of the Earthquake which Destroyed the City of Lisbon, on the First of November, 1755;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Previous to that Calamity: Illustrative of the Great Picture of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Now Exhibiting at the Lyceum, Strand. printed by W. Glendinning, n.d..

Anon. *An Account of the Late Dreadful Earthquake and Fire, which Destroyed the City of Lisbon, the Metropolis of Portugal. 2nd ed*. London: reprinted and sold by Green & Ruffell, 1756.

Anon. *Authentic Memoirs concerning the Portuguese Inquisition.* London: printed for W. Sandby, 1756.

Anon. *Poem on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W. Owen, 1755.

Anon. *Serious Thoughts occasioned by the lat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1755.

Baller, Joseph. *Divine Alarms and Warnings to a sinful People considered and improved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Dilly, 1756.

Bearcroft, Philip.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Lord-Mayor Feb. 6, 1756.* 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Owen, 1756.

Blair, Hugh. *Rhetoric*. Philadelphia, 17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lkley, Charles. *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Evening-Lecture on Sunday November 30, 1755.* London: printed for J. Payne, 1755.

Bulkley, Charles.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National Reformation: A Sermon Feb.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J. Payne, 1756.

Burke, Edmund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y.* Dublin: printed for Sarah Cotter, 1766.

Clark, Samuel. *A Sermon preached at Daventry December 7, 1755.*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Buckland, 1756.

Cradock, John.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Paul, Covent Garden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S. Baker, 1756.

Cruden, Alexander. *The Corrector's Earnest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Britain*. London: sold by A. Dodd, 1756.

Defoe, Daniel. *The Storm, or A Collection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asualties and Disaster which happened in the Late Dreadful Tempest, both by Sea and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G. Sawbridge, 1704.

Edwards, Thoma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Michael in Coventry, on February 6, 1756.* Coventry: printed by T. Luckman, 1756(?).

Ferguson, Adam.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2 vols.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1995.

Gambold, John. *The Reasonableness and Extent of Religious Reverence: A Sermon Feb. 6, 1756.* London: printed at Brethern's Chapels, 1756.

Gibbons, Thomas. *A Sermon on occasion of the tremendous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 Buckland, 1755.

Gifford, A. *Serm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reat Storm, commonly called the High Wind, in the year 1703, Nov. 27 1734.* London: printed for Aaron Ward, 1734.

Gourevitch, Victor. (ed.)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lifax, James. *A Sermon preached February 8, 1756.* London: printed by J. Hughs, 1756.

Hazeland, William. *The Conclusions of Atheists and Superstitious Persons from Public Calamities examined in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6th of Februa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J. Beecroft, 1756.

How, James. *A Sermon on Occasion of the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Rivington, 1756.

Hume, David.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7.

Hutton, James. *Abstract of a Dissertation read at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Concerning the System of the Earth, its Duration and its Stability.* Edinburgh?, 1790?.

Kant, Immanuel. "Fortgesetzte Betrachtung der seit einiger Zeit wahrgenommenen Erderschütterungen." In Wolfgang Breidert (ed.). *Die Erschüterung der Vollkommen Wel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4.

Kant, Immanuel. "Geschichite und Naturbeschreibung der merkwürdigen Vorfälle des Erdbebens, welches an dem Ende des 1755sten Jahres einen grossen Teil der Erde erschüttert hat." In Wolfgang Breidert (ed.). *Die Erschüterung der Vollkommen Wel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4.

Kant, Immanuel. "Von der Ursachen der Erderschüterungen bei Gelegenheit des Unglücks, welches die westlichen Länder von Europa gegen das Ende des vorigen Jahres betroffen hat." In Wolfgang Breidert (ed.). *Die Erschüterung der Vollkommen Wel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4.

Kant, Immanuel. *The One Possible Basis for a Demonst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rans. Gordon Treash. New York: Abaris Book, 1979.

L'abbe, De. M. & De M. Le V Walsh (eds.). *Encyclopédie Catholique*: *Répetoire Universal et Raisonne.* Paris: Parent Desbarre, 1848.

Mason, John. *The Christian's Duty in a time of publick Danger: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J. Noon, 1756.

Michell, John.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Cause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Phaenomena of Earthquakes.* London, 1760.

Milner, John. *Ruin Presented by Repentance, applied to Civil Societies;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J. Noon, 1756.

Milner, John. *Two Discourses delivered at Peckham in Surrey on the General Fast, February 6, 1756 occasioned by the late dreadful Earthquake at Lisbon.* London: James Buckland, 1756.

Moss, Charles. *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Jam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stminster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Being the Day appointed by his Majesty for a General Fast, on Occasion of the late Earthquakes. London: printed for J. Whiston & B. White, 1756.

Mossner, Ernest C. & Ian S. Ross (eds.),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Nowell, William. *A Sermon.* Newcastle: printed for J. Richardson, 1755.

Orton, Job. *Noah's Faith and Obedience to Divine Warnings: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J. Eddowes, 1756.

Parnther, John. *A Sermon*. York: printed by Caesar Ward, 1756.

Peckard, Peter. *A Dissertation on Revelations.* London: printed for W. Owen, 1756.

Pennington, John. *A Serious Call to Repentance A Sermon.* Cambridge: printed by J. Bentham, 1756.

Pickering, Roger. *An Address to Those who have either retired, or intended to leave the Town, under the imaginary Apprehension of the Approaching Shock of another Earthquake Being the Substance of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W. Johnston, 1750.

Smith, Adam.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Smith, Adam.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76.

Squire, Samuel. *A Speedy Repentance the most effectual Means to avert Gods Judgment 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Anne Westminster February 6, 1756, On Account of the late Dreadful and Extensive Earthquakes.* London: printed for Charles Bathurst, 1756.

Stebbing, Henry. *A Sermon preached at Gary's Inn Chapel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Lockyer Davis, 1756.

Tailer, John. *The Inefficacy of the Greatest National Strength to Secure from the Divine Judgment: A Sermon.* London: printed for J. Buckland, 1756.

Terrick, Richard.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Shuckburgh, 1756.

Thomas, John Lord, Bishop of Lincoln.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Abbey-Church of Westminster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London: printed and sold by J. Oliver, 1756.

Totton, William. *Two Sermons preached on Friday, February 6, 1756 and Februa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 (London, printed for W. Innys, 1756.

Wallin, Benjamin. *The Christian's Duty and Confidence in Times of Public Calamity: Being Several Discourses Occasioned by the Late Dreadful Earthquakes*. London: sold by George Keith, 1756.

Webster, W. *The Nature, Causes and Design of God's Judgment: Set forth in a Sermon*. London: J. Brotherton, 1756.

Wesley, Charles. *A Sermon preached from Psalm xlvi. 8. Occasioned by the Earthquake on March 8 1750*. 2nd Edition; London, 1754.

Winthrop, John. *Lecture on Earthquakes.* Boston, 1755.

康德著，李秋零譯，《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二、二手文獻

Bell, Martin. "Hume on the Nature and Existence of God." in Elizabeth S. Radcliffe (ed.) *A Companion to Hum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Bilham, Roger. "The 1737 Calcutta Earthquake and Cyclone Evaluated." *Bulletin of Seismology of American Society* 84:5 (1984), pp. 1-10.

Brightman, Edgar. "The Lisbon Earthquake: A Study in Religious Val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3:4 (1919), pp. 500-516.

Brown, Robert H. "The 'Demonic' Earthquake: Goethe's Myth of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Fear of Modern Change." *German Studies Review* 15: 3 (1992), 475-491.

Chaplin, Joyce. *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rsuit of* Geniu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Chen, Jeng-Guo. "Providence and Progress: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Ferguson's Discussion of Civil Society." in E. Heath and V. Merolle (eds.) *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8.

Christensen, Jerome. *Practicing Enlightenment*: *Hum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terary Care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Cregeen, Eric.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House of Argyll." in N.T. Phillipson and Rosalind Mitchison (eds.), *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laforce, Angela. "The Dream of a Young Architect: Robert Adam and a Project for the Rebuilding of Lisbon in 1755." in Angela Delaforce (ed.) *Portugal e o Reino Unido: A Aliança Revisitada.* Lisbon: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1995.

Emerson, Roger. *Academic Patronag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Glasgow, Edinburgh, and St. Andrew's Universit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nca, Jose-Augusto. "La Lisbonne du Marquis de Pombal: ville des lumieres." in X. Malverti (ed.) *Collection Villes et societies.* Paris: Picard editeur, 1997.

Georgi, Mathew.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British public sphere." in Theodore E. D. & John Radner (eds.) *The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Representations and Reaction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5.

Gutscher, Marc-André. "What Caused the Great Lisbon Earthquake?" *Science* 305: 5688(2004), pp. 1247-8.

Hill, Lisa.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Dorecht: Springer, 2006.

Himmelfarb, Gertrude. *The Roads to Modernity*: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New York: Knopf, 2004.

Ingram, Robert G. "The Trembling Earth and God's Herald: Earthquakes,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Britain during the 1750s." in Theodore E. D. & John Radner (eds.) *The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Representations and Reaction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5.

Israel, Jonathan.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Kendrick, T. D. *The Lisbon Earthquak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55.

Larsen, Svend Erik. "The Lisbon earthquake and the scientific turn in Kant's philosophy." *European Review* 14:3(2006), pp.359-367.

Levine, Michael. 'Hume on Miracle and Immortality,' in Elizabeth S. Radcliffe (ed.) *A Companion to Hum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Löffler, Ulrich**.** *Lissabons Fall- Europas Schrecken: Die Deutung des Erdbebens von Lissabon im Deutschesprachen Protestantismus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9.

Mossner, E. C. *The Life of David Hu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Neiman, Susan. *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Norton, David. *David Hume: Common-Sense Moralist, Skeptical Metaphysici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enelhum, Terence. "Hume's Views on Religi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Elizabeth S. Radcliffe (ed.) *A Companion to Hum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oirier, Jean-Paul. "The 1755 Lisbon Disaster, the Earthquake that Shook Europe." *European Review* 14:2(2006), pp.169-180.

Poirier, Jean-Paul.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Lisbonne*. Paris: Odile Jacob, 2005.

Porter, Roy.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in R. Porter & M. Teich (eds.)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orter, Roy. *Enlightenment*: *Brita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0.

Price, John Valdimir. 'David Hume's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Composition and Publication,' in A. Wayne Colver and John V. Price (eds.) *David Hume on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Quenet, Grégory.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Sher, Richard. *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Simpson, John M. "Who Steered the Gravy Train 1707-1766." in N.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 (eds.) *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0.

Taylor, Charles.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Young, B. W. *Relig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ological Debate from Locke to Burk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Youngson, A. J. *The Making of Classical Edinburgh 1750-184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陳正國，〈宗教與世俗的辯證——佛格森論歷史與自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與研究所集刊》，七十九本二分，2008年，頁 187-233。

楊肅獻，〈英格蘭有啟蒙運動嗎？〉《新史學》第9卷第4期，1998年，頁 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llectual Responses in Britain to the Lisbon Earthquake

Chen, Jeng-guo*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reactions in Great Britain to the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Unlike French and German reactions to the earthquake, the British counterpart is much understudi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atterns of reactions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were very much different. In England, the Church took a leading role in making public sentiments about the event and its ramifications. It argues forcefully that the earthquake agitated an Evangelical revival and antipathy of Catholicism. In addition, many churchmen consciously appropriated the earthquake event to call fo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loyalty of the convents on the eve the Seven Year's War. Theologically, those churchmen were inspired by the event to dispute ideas of natural religion in face of Revelation religion. In Scotland,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intellects and writers alike generally kept their view of religion as metaphysical as before. Not only the skeptical David Hume, but also moderate Adam Ferguson, Church leaders such as Hugh Blair and others said no words of the earthquake. The collective silence in Scotland shows their hesitation to Revelation religion. Accordingly, physical evils were treated as pragmatic issues and severed from religious or transcendental meanings.

Keywords: Lisbon Earthquak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Natural Religion, Evangelical Revival, Provid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